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



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旧址

位于澄江街道高巷路 2 号。系江阴民族工商业家、爱国民主人士吴汀鹭于民国六年（1917）建造。1937 年被日寇抢占为驻澄司令部。1947 年底，国民党军队将其作为要塞司令部。渡江战役发起之时，我地下党员在此成功策动了国民党官兵起义。江阴解放后，为驻澄解放军某部机关，1949 年 4 月，华东海军机关在此成立，后为解放军国防科工委二十三基地使用。江阴市人民政府和部队产权置换并修缮后，于 2004 年 5 月 1 日对外开放。该建筑有照壁、天井、前、中、后房屋三进，占地 3752.7 平方米，建筑面积 1248.92 平方米，前二进为中式古典建筑样式，继承了晚清时期建筑工艺和风格，第三进吸收了西洋巴洛克风格。建筑所有外墙体均用清水方砖砌成，红灰相间，古香古色，堪称中西合璧的完美之作。

要塞司令部旧址外观



要塞司令部东侧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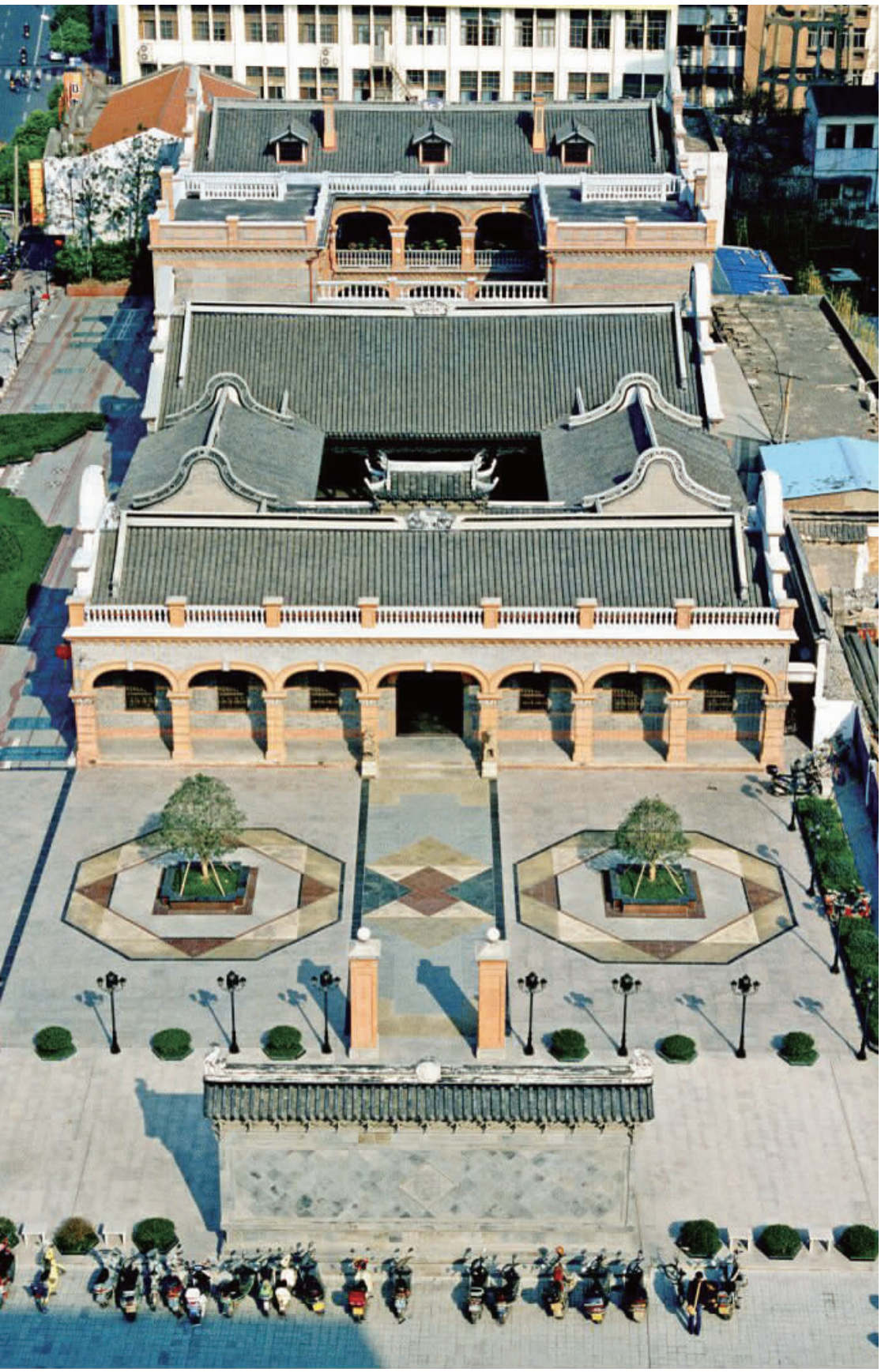
要塞司令部旧址第三进及侧厢



第三进二楼会客厅



第三进二楼走廊



江阴文博

俞伟超题

主办单位：
江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江阴市博物馆

《江阴文博》编委会：

顾　　问： 袁秋中　程　政
张韶峰
主　　任： 周晓虹
副 主 任： 严文华　吴有为
协　　调： 谢　诚
主　　编： 翁雪花
副 主 编： 刁文伟　孙　军
责　　编： 周利宁
美　　编： 孙　军
编　　委： 高振威　邬红梅
江小方　周家坤
张焕兴
特约编审： 唐汉章

2019 年
总第 36 期

内部学习交流

CONTENTS 目录

研究·心得

郁金为凤凰 嬉戏双鸳鸯——细说明代江阴夏元贞妻邹氏墓出土金银首饰

翁雪花 01

江阴博物馆馆藏明清银锭 邬红梅 09

江阴古城布局复原研究 黄一哲 15

馆藏服饰文物整理侧记 钱晓洁 陈 龙 29

《重建浮海观音殿记》考 李煜章 35

史事·名贤

北京西山访叶飞——纪念江抗东进 80 周年 徐泉法 40

刘半农与南社琐记 李建华 47

“五四”运动影响下的江阴革命活动——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而作

薛仲良 51

郑觐文对民族音乐的贡献 陈正生 57

请关注江阴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特展·大事

传统的未来，江博 5·18 奇妙夜再现 —— 刘玉君 62

从非遗展品看燕京八绝 —— 沈晓燕 65

2018–2019 江阴博悟联盟成果回顾 —— 吴婉玲 80

2019 年江阴文博大事记 —— 王晓燕　钱　蓉 83

封面　封底介绍　清嘉庆六年江阴县木质校准官斛 —— 周利宁

封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江阴国民党要塞司令部旧址 —— 王晓燕

封三　临展撷英 —— 张玉庭（文）　杨民（图）

郁金为凤凰　游戏双鸳鸯

——细说明代江阴夏元贞妻邹氏墓出土金银首饰

◎ 翁雪花

习礼夏氏为江阴望族，原为河南陈州夏氏，四世祖夏曼随宋室南渡而居江阴习礼（习礼村是江阴长泾镇的一个自然村，古名七里村，在集镇东南 2 公里，东清河中贯村境，系北去江阴、张家港、常熟，南往苏州、无锡的水运要道。北宋时，因唐氏习礼始居于此，地以人名）。夏氏家族历代多隐德不仕且勤俭持家，擅内治田园外应门户，因此自宋元以来皆为常（即今常州市，江阴原隶属常州府）之巨族。按《长泾镇志》：洪武三年，南京构筑皇城，七世夏以愚首建砖窑制砖；成化元年，九世夏希明捐金初浚泾水，并跨河建兴顺桥；弘治四年，十世夏良惠建兴福桥。由此可知夏家富甲一方。其中十世夏良惠更是称富江南，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夏良惠“一夜致富”、“划地为银”等传说。夏良惠广置产业，相距各数十里，分别由其四个儿子掌管，其中第三子夏元贞（夏谅）即居香墩，今青阳悟空村。

1977 年江苏江阴青阳农民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古墓葬。出土有一盒墓志铭，由李东阳门人明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邵宝撰志文，志文表明该墓主姓邹，系夏元贞之妻。邹氏墓出土二十余件金银首饰，虽然因发掘较早，没有科学的保留簪戴情况，但这套首饰种类多、样式精美，再现了 300 年前江南女性的美丽。

“髮髻”是女子戴在发髻上的发罩，又有发鼓之称,该名宋代已经出现，也写作“发骨”，一般用金银丝、头发、马尾等编结而成，内外可衬覆帛、纱、布等织物，以适应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打扮。明代女子梳好发髻，只戴髮髻，不插簪钗也是体面的，可以出门见人。作为已婚女子的正装，有财力的人家会置办金丝或银丝髮髻。邹氏墓出土的银丝髮髻（图 1），外轮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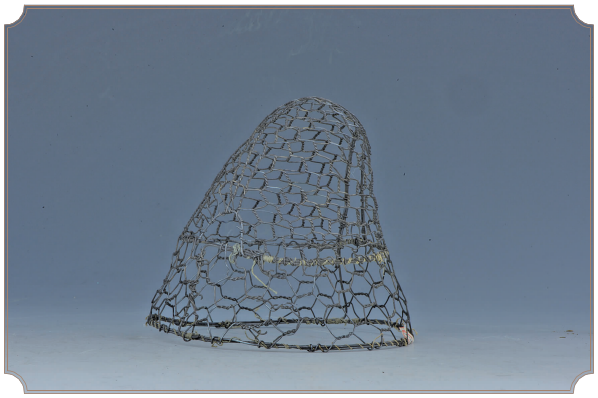


图 1、银丝髮髻

形似小尖帽，以直径 1 毫米银丝为框于中部偏下拦腰横隔成上下两部分，上部接近圆锥形，下部外侈像一圈帽檐，通体以 0.8 毫米的银丝编结网络，有六角形和长方形两种。并在中腰的粗银丝上留有拱形窗眼，背面则留出牛角形窗眼，用以插戴其他可搭配成头面的首饰。

“挑心”总是单独的一支，插在整个发髻上最中心、最引人注目的位置，是明代头面的点睛，因此总是制作得玲珑奇巧、夺人眼球。邹氏墓出土的金嵌宝凤凰挑心（图 2），凤凰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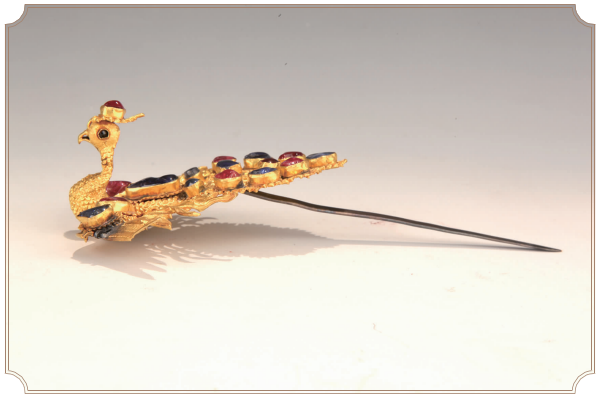


图 2、金嵌宝凤凰挑心

顶是一个嵌了红宝的花叶式凤冠，凤首用一道道短而细的金丝绕眼作圆周状层层编出，中间烘托着黑溜溜用宝石点缀突出的眼睛，显出调皮和娇俏来（图 3）。尖喙微张，仿佛欲鸣叫，又似要低语。凤凰胸腹部锤錾而成，凤颈打了个 s 形的弯，满布翎毛片的胸脯饱满突出极富层次。凤尾则羽扇般展开，绽出十一朵菊花（图 4），每朵花心盛着红蓝相间的宝石，张开的一对翅膀上同样装点着红蓝宝石的菊花。若将此簪插于发髻中心，宛若凤凰停落在美人秀发之上，妙不可言。神鸟加身的绮丽，犹如一团金



图 3：金嵌宝凤凰挑心细部 1

色中的涅槃，想象便由这支簪而实现。古诗云“凤凰簪落鬓”[1]，说的不就是这种感觉么？

“花钿”戴在鬓髻的下口沿。长条形，有弧度。一种花钿背后有垂直向后的簪脚，另一种无簪脚却在两端系有扎带，用时将带子系在鬓髻两边的簪子上固定。邹氏墓出土的金嵌宝花钿



图 4：金嵌宝凤凰挑心细部 2



图 5、金嵌宝花钿

（图 5）呈弧形环带状。簪首制成菊花、牡丹花等 9 朵花，每朵花均嵌红蓝相间随形宝石作花蕊，配以偃仰有致的小金叶，弧形两端呈叶形装饰，扁条形银簪身向后伸出。

“顶簪”多有一个长长的杆，由于在顶部，簪杆插入发髻内，隐藏不可见，因此簪杆的形式、内容、材质不甚考究，而露出的簪头便显得重要起来。若是单纯的花，便一定是数重花叶层层密密向上，间配蜂蝶，簇拥成一个立体的花台；或又顶端嵌宝，显出别致来。邹氏墓出土的金嵌宝大花顶簪（图 6），簪首自下向上由两层小花台阶状簇拥出一朵大大的花来，花



图 6：金嵌宝大花顶簪

蕊由冠状的金托和艳艳的红宝形成色觉的美。簪身亦为金质，且錾刻卷草云纹。初看不甚抢眼，细看却亭亭玉立，别具一番风致。

“掩鬓”以簪戴于两鬓而得名，是倒插在鬓边用以押发的。造型上多采用桃形、团花形、朵云形，因是成对出现，便如图画般美妙。朵云或团花的轮廓，脱离方或直角的生硬，造型的圆润，将设计好的程式化的场景愣是搭建出明快。四时之变化，节气之更迭，既反映现实生活，又营造出一种情绪。邹氏墓出土的金天师骑艾虎银脚掩鬓（图 7），隐起表现仙人驱毒



图 7、金天师骑艾虎银脚掩鬓

的场面。据《明史》载：三月清明穿“秋千”补子，五月穿“五毒艾虎”补子，七月七夕穿“鹊桥”补子，九月重阳穿“菊花”补子，十一月穿“阳生”补子。再有，端午时节江南等地流行“驱五毒”、“插健人”的风俗[2]。因此，此类簪当为应景时与服装配套使用。明无名氏著《天水冰山录》中有“金厢天师骑艾虎首饰”[3]的名目，邹氏墓出土金天师骑艾虎银脚掩鬓当属同类。在民间，比较流行的是张天师驱毒斩妖的传说，《水浒传》以“张天师祈禳瘟疫”为第一

回，正是这种传说的写照。项安世《重午饷菜楚俗也邓抚干以诗来谢次韵答之三首》“大家朱书亭午时,人家艾人张天师”，刘克庄《乙卯端午十绝》“门有艾天师”，苏辙《皇太妃阁端午帖子》“太医争献天师艾”皆是。天师艾常做成天师御虎状,魏之《失调名》描写很形象:“挂天师，撑著眼，直下觑。骑个生狞大艾虎。”宋代的风俗延续到明代，普通人家的女子以艾为小虎，或剪彩为小虎，贴以艾叶，争相戴之，（明高濂《四时幽赏录》）富贵人家的女子就更为高贵些。邹氏墓出土的这对掩鬓大小相同，方向相反，骑虎天师披发、跣足、肩披霞帔，一手执锄，一手提花篮，且锄头恰好压在蝎子身上（图 8）。相较构成主画面的骑虎天师、蝎



图 8、金天师骑艾虎银脚掩鬓细部

子、蜈蚣、三脚蟾蜍，做为陪衬的山石、松树、或许还有隐藏在树丛的蛇或其他毒物，将画意衍伸出去，不由令人意欲探个究竟。

明代女性讲究满头珠钗，不露头发为上，作为整个头面的点缀，蝶赶花、蜂赶花、以及草虫簪，便成为华美富贵中的另一种风情，这一类簪是一种活生生的美，取自大自然，藏在记忆里。邹氏墓出土的金嵌宝蝶赶花顶银脚簪（图 9），蝶花相映成趣，花叶错落有致，金身蝶



图 9、金嵌宝蝶赶花顶银脚簪

掩于花叶间，乍看浑然一体，却因镶嵌宝石颜色不同，金色蝶须的颤动不止，显出牡丹之雍容华贵，衬出蝴蝶的纤巧灵动（图 10）。发簪的



图 10、金嵌宝蝶赶花顶银脚簪细部

美，不光在于其制作精致，更在于它强调的是一种动态。所谓“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金镶蝴蝶闹纷纭”，大致类此。轻巧玲珑的蝴蝶牡丹斜斜的插在两边，将会是何等温婉柔情。邹氏墓出土的另一对金螳螂捕蝉顶银脚簪（图 11），螳螂的翅膀极度地张开,三角形的头顶在灵活的脖颈上，将可怜的蝉夹在那对长满锯齿的



图 11、金嵌宝螳螂捕蝉顶银脚簪



图 12、金满池娇后分心

前足之中。此簪结合昆虫的形体特征，用写实手法表现螳螂的矫健，蝉置于其下的无奈。作为明代常见的草虫形象，螳螂和蝉在服装上也频频出现。蝉因其高洁品性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而螳螂作为捕食害虫、对农业有益的益虫也被人们喜好，明人笔记《碎金·虫豕篇》[4]中就将人列为裸虫之长，螳螂列为虫豕之首。上海朱守诚夫妇墓[5]中出有成对鎏金螳螂银簪，苏州五岭山[6]出有金蝉伏玉叶簪，体现的是螳螂或蝉的单体形象。邹氏墓出金嵌宝螳螂捕蝉顶银脚簪却将两物置于一体，化静态为动态，采撷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环，情趣盎然。

“分心”是明代头面中的另一个点睛，有前分心和后分心之分。因为落在鬓髻的下部，面积便有了伸缩的空间，可体现的玲珑精巧就有了发挥。邹氏墓出土金满池娇后分心（图 12）系用整块金片锤压而成，隐起图案，立体感极强，莲蓬饱满突出于中心，两边鸳鸯对立相向，突起略低于莲蓬，再有侧向莲花更低于鸳鸯，整个画面极富层次感，花叶边缘均为短阴线，密而有序；花瓣及鸳鸯翅羽上錾长阴线，且随形忽长忽短；鸳鸯在处理上也是手法多变，脸部组丝工艺，用短平行线表现丝毛之参差；胸腹部鳞状，用点錾排成弧形组成，显示绒羽之柔密；翅部鳞状，采用弧形錾，无细纹，突出翅膀之丰满。并在花草上点戳疏朗的梅花点。多种錾刻技法的运用，使各部位凹凸分明，层次清楚，疏密有间。满池娇是一种宫廷服装图案的名称，描绘的是池塘中的花、鸟景色。花一般是荷花，鸟一般是鸳鸯，都是池中之物，所以叫满池娇。临镜，鬓鬟之间，放入一抹娇柔和旖旎。

女子簪戴中还有起固定作用的金花簪和金花啄针。邹氏墓出土三对花头各异的金花头银脚簪（图 13），簪头呈伞状，银质圆杆。簪头錾成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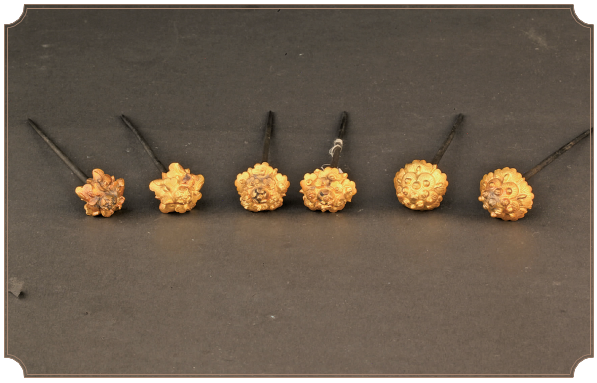


图 13、金花头银脚簪

丹、莲蓬等不同花形。花瓣仰合起伏、多姿多态。而三个纯金质的小啄针（图 14），圆锥形。簪头亦各异，分别呈葵花头、单瓣覆莲头、复瓣覆莲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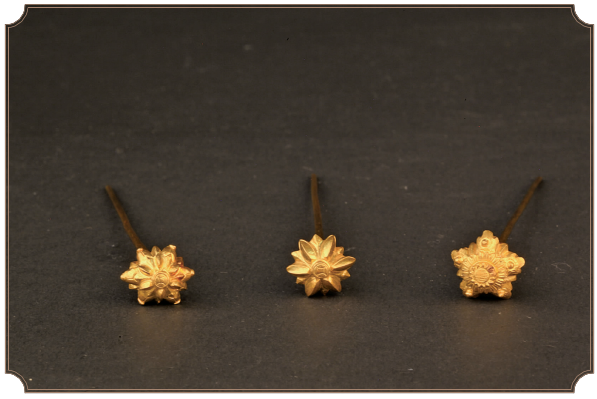


图 14、金啄针

除了簪戴在头上的发饰，耳垂、皓腕、领口都是不容忽视的妆点。邹氏墓出金嵌宝蝶赶花耳环一对（图 15），钩状金丝弯脚下接“蝶赶花”坠饰。最上端为小蝴蝶，金托周围以薄金片打制成蝴蝶翅膀，金托内镶嵌蓝宝石为蝴蝶身体；蝴蝶下接两朵花，花心各嵌方形红宝石一颗，且用金片随宝石形状围成浅框，金托外以薄金片打制成花瓣形状。两花背面锤錾处方胜形纹饰；金龙首联珠纹手镯一对（图 16），阔鼻深目，细部錾刻龙鳞；金银锭形搭扣一副（图 17）套结子母结构，柄部制成银锭形，母扣扣圈作圆形，内套圆形子扣。共有四个钉线孔眼，造型简单又不失精巧。



图 15、金嵌宝蝶赶花耳环



图 16、金龙首联珠纹镯



图 17、金银锭形搭扣

关于这批金银饰的主人邹氏，邹宝为其写的墓志铭是第一手资料，而这个女子，在家谱上保留的文字资料也比较多。既有其兄长邹益写的《祭亡妹邹孺人文》，又有晚辈夏从寿撰文的《秋涯公配邹孺人行状》。参考这些文字资料和出土墓志铭，不难勾勒出邹氏大致的生平：1、邹氏生于成化甲辰十二月二十九（1484 年），卒于正德辛巳三月二十六（1521 年），享年 38 岁；2、邹氏父亲无锡泰伯邹智卿，“崇诗礼敦孝义”；母亲无锡鹅湖华氏，“俨然大家闺范”。兄弟姐妹七人；3、邹氏温柔贤惠，且“庄重自持不妄言笑”“能妇且功与言”深得父母兄长喜爱，精心挑选嫁于同是江阴望族的习礼夏良惠之子夏元贞[7]（夏谅，字元贞，由邑庠生例贡入太学授福建建宁府瓯宁县主簿致仕）。婚后孝顺公婆，勤俭持家，“不以殷厚自挟”“以至外人不知其出身富家”。

明代墓志中有许多关于女性生命历程中女、妻、母各个阶段的记载，无外乎先是“养在深闺待贤婿”，续而“嫁入夫家孝事姑 ”最后“勤俭持家相夫君”。无论富有与否，江阴的邹氏也过着那个年代女性所特有的生活。明代苏州诗人吴鼎芳的《唐嘉会妻》，叙述了唐嘉和杨云芳之间凄婉的故事，故事的本身无关爱情，却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其中的两句“朝日照清池，游戏双鸳鸯”“头上何所饰，郁金为凤凰”流露出养在深闺待嫁贤婿小女儿对未来的憧憬。邹氏墓出土的最为精美的两件簪是金嵌宝凤凰挑心和金满池娇后分心，前有凤凰，后有鸳鸯。像是这两句诗的实物写照。比之殉情的杨云芳。邹氏嫁得夏元贞，夫妻恩爱，也算如心如愿。只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象个紧箍咒，成为邹氏的心病。“夏元贞艰于嗣，令人（邹氏）复多为之置妻妾，卒无子，乃谋于元贞以伯兄元夫之子舆为后”[8]“妹（邹氏）之贤之淑宜有子矣，而弗得”[9]“君弥壮未有嗣，孺人（邹氏）以为忧，数为君置妾待如同气，有所出则摩煦周至。然皆不育，乃谋于君请于翁以伯兄之子舆为后”[10]，审视邹氏墓出的金银首饰，纹饰中除了凤凰、牡丹这样标志富贵的图案，六件金花头银脚簪和三件金花啄针花心或花瓣上皆有突起，意含多子多福；赵长卿词云：“见浴兰才罢，拂掠新妆，巧梳云髻。初试生衣，恰三裁贴体。艾虎宜男，朱符辟恶，好储祥纳吉。”，词中将艾虎和宜男连在一起，宜男是颂祝女子多子之词。金张天师艾虎掩鬓除了有辟邪的含意，可还含着祈福祈子的虔诚？而金嵌宝螳螂捕蝉顶银脚簪，构图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语出《庄子·山木》，是庄子主张清心寡欲，忍让屈从，顺乎天道自然思想的反映，可又是明代女子精神的寄托？嫁为人妇的邹氏，在一个个晨起梳妆，将渴望淡化作忧郁与惆怅。

首饰是中国女子不可或缺的一种日常物品，但又不仅仅是单一日常用品，乌发一旦挽起，各类玲珑簪环绕，耳垂明月当、皓腕约秀镯、形体散发出的意蕴，总是令人神往的。注视着这些昔日女性贴身相伴的文物，恍惚看到隔世的繁华与沧桑以及悲欢离合的故事。

注释：

［1］南朝诗人吴均的《去妾赠前夫》

［2］《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23页、第90页

［3］丛书集成初编《知不足斋丛书》之《天水冰山录》，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第34页

［4］《碎金·虫豕篇》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影印，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出版第40页

［5］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诚夫妇合葬墓》，《文物》1992年第5期第65页，图二十六

［6］南京博物院、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省博物馆、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江苏省十年来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发现》，《考古》1960年第7期图版贰：肆

［7］《秋涯公配邹孺人行状》“（孺人）日惟婉娈承志，父母之爱钟焉，相与私喜曰‘日善事我必善事人，慎勿嫁’”

［8］《秋涯公配邹令人墓志铭》，《习礼夏氏宗谱卷四十六》

［9］《祭亡妹邹孺人文》，《习礼夏氏宗谱卷六十》

［10］《秋涯公配邹孺人行状》，《习礼夏氏宗谱卷五十八》

（作者：江阴市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江阴博物馆馆藏明清银锭

◎ 邬红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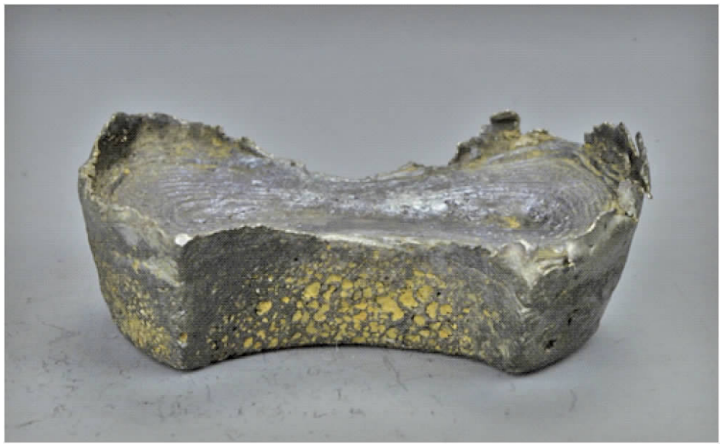
明代是白银货币化的重要阶段，白银广泛应用于商品贸易、交纳赋税、贮藏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支付，白银已基本作为货币使用。这一时期银锭的器型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从宋元时期的平板束腰形，向明清时期的元宝形演变。明代银锭是古代银锭发展的重要阶段，是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证。

江阴博物馆馆藏的明代银锭大部分为出土的，其中有 2 组 4 件是有明确出土地点、明确纪年、明确墓主人的墓葬出土的，这 4 件墓葬出土的银锭尤为重要，为研究明代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材料。博物馆所藏银锭虽然没有铭文，但从银锭所出土墓葬的时间或银锭的形制可以划分出明代早中晚期，可以看出明早期至明晚期银锭形制的变化，为明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的发展提供佐证。另外，博物馆还藏有一件清代咸丰年间带铭文五十两银锭也一并作一概述。

江阴博物馆馆藏明代银锭，可分为明代早中晚三期：

一、明早期

编号 97–4，明早期银锭（图一），通长 75、通宽 50、通高 27mm，重 369.93g， 银锭为四周起翅的平板束腰形，锭面为弧首束腰状，四周起矮翅，矮翅从中间向两侧逐渐增高，一侧起翅部分残断。锭面有清晰的丝纹，分布均匀。外部侧面及底部布满大小深浅的凹坑，有数处深蜂窝



图一　编号 97–4 明早期银锭

孔。此件银锭 1996 年 11 月出土于江阴顾山镇香山周闳夫妇合葬墓中的女性墓坑。根据出土墓志，周闳字宗大，生于明洪武八年（1375）卒于永乐二十年（1422），洪熙元年与妻邓氏合葬于顾山祖茔。周宗大生前经营扶持，田畴广增，家业兴盛，后外出被刺受伤身亡。此件银锭随葬时间有明确纪年，是这一时期银锭的标准器。

编号 JC 银 1–4（图二），明早期银锭，共有 4 件，来源不详，基本完整，形制基本一致，通长 140 –146、通宽 100–105、通高 25–48、重 1,840 – 1,850 g，锭面为弧首平板束腰状，周边起矮翅。锭面有清晰的丝纹，分布均匀，外部侧面及底部布满大小深浅的凹坑，底部多处有深蜂窝孔。锭面锈蚀不严重，银锭均呈银色光泽。这四件银锭的形状具有明代早期的特征，为明代早期五十两大银锭。



图二　JC 银 1　明早期五十两银锭

明早期银锭大致以洪武、永乐、宣德时期为代表，此时期全国锭形基本一致。从以上几件银锭可以看出，明早期基本继承元代稍起翅的平板束腰形，与元代银锭相比有继承有发展，形状基本相似，但两侧起翅明显，比元代略高，丝纹更加明晰，银锭底部、腰部等处轮廓分明，转折明显。顾山出土的银锭换算成古代银两约为 12 两左右，应是明早期民间用银锭的典型代表，而墓主人虽没有官职，但家境殷实，墓葬中随葬了数量较多的明器，有生活用具、锡质明器、木质家具模型等等，均较为小巧精致，所陪葬的这件银锭也可证明其家庭的富裕程度。另外的四件五十两大银锭保存完好，基本没有锈蚀，制作也堪称精良，是明代早期银锭的精品。

明代早期与元代货币流通制度基本一样，用银的情况也与元代相似。明朝政府在建国之初，一方面由于国内尚有战事，铜钱供应困难等方面的原因，大力推行钞法，实行以钞为主，以钱为辅的混行流通制度，而在明早期，为了防范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禁止海外贸易往来，禁止金银流通，但民间海上商贸活动始终未能禁绝，民间贸易一直使用白银，这座顾山明墓中出土的银锭造型规整、丝纹清晰，应是较为正规的有一定规模的作坊所制，说明当时民间铸银、用银的情况也十分普遍。1988 年江阴陆桥镇陆氏家族女性墓和 2004 年江阴长泾镇夏氏家族墓，均出土了大明通行宝钞，这两座明代永乐年间的墓葬中共出土过 7 张中书省宝钞和 1 张户部宝钞[1]，可见明早期用钞极为流行。而在江阴陆氏家族墓中的女性墓主的墓穴四角各置一块石质锭形棺垫，棺内底部铺有纸质银锭形冥垫，可

见明早期用钞的同时，银锭在民间的影响力也是较大的。

二、明中期

编号出 43–2、3，明中期银锭(图三)，两件银锭均于 1977 年 10 月 9 日出土于江阴市长寿镇明代徐鼎墓，两件银锭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略有差异。出 43–2，通长 63、通宽 26、通高 30mm，重 88.7g。出 43–3，通长 60、通宽 26、通高 24mm，重 92.24g。两件银锭为船形，两端向上起翅，锭面为弧首束腰形，束腰明显，锭面分布均匀清晰的丝纹，银锭外部侧面有凹坑并有深浅不一的蜂窝孔，底面布满大量的深蜂窝孔洞。银锭表面有明显的黑色包浆，少部分露出亮银色。两件银锭基本为 3 两左右的小银锭，器型虽小，但较为规整。



图三　编号出 43–3 明中期银锭

徐鼎，字惟器，生于明正统年间，卒于正德己卯年十二月十九日（1519），享寿七十六。徐鼎从小天资聪颖，喜好读书，于明成化年间谒选湖广永州推官。徐鼎祖父徐麒（1362–1445），字本中，号心远，明洪武年间以布衣应诏，出使西蜀，招扶羌人，得一品朝服告归故里。徐鼎一族在明代属江阴大族，族内人才辈出。徐鼎墓以及其妻吴氏墓随葬品较为丰富，有金银首饰、生活用品、垫背钱等等，可见家境十分富裕。两件银锭的形制具典型的明中期特点，是明中期银锭的标准器。

编号 JC 银 5、6，明中期银锭（图四），来源不详，两件银锭形制基本一样，JC 银 5，通长 70 、通宽 29、通高 30 mm，重 93.9 g，JC 银 6，通长 62、通宽 30 、通高 34 mm，重 93.550g，银锭基本完整，呈船形，两端起翅，翅较长，锭面为弧首束腰状，丝纹清晰均匀，银锭外部表面分布浅凹坑，一侧的外部及底面布满蜂窝孔洞。这两件银锭的形制与明中期徐鼎墓出土的银锭基本相同，唯两端起翅较长，亦属明中期银锭。



图四　编号 JC 银 5　明中期银锭

明代中后期银锭形制变化较大，由宋元时期的平板束腰形，逐渐变为明清时期常见的立体起翘的船形元宝状，明中期的船形银锭与明末清初的银锭相比又有所不同，明中期锭体较薄、较窄，造型显得纤细、轻巧，起翘亦较长，而明末清初锭体较厚较宽，起翘变短，显得较为厚重。

永乐后期，大明通行宝钞的贬值已相当严重，政府为稳定宝钞流通，稳定物价，采取了禁用铜钱、金、银等许多措施，但终因发行数量无限制，导致宝钞贬值，宝钞越来越没有实用价值，大宗交易及民间流通中仍使用白银。明英宗正统年间解除银禁，白银大量流通，与铜钱并行，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无论大宗交易还是日常买卖均用银钱支付。明中期以后形成了以银为主，铜钱为辅的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起了积极作用。徐鼎生活于明代早中期，卒于明中期，两件银锭的出土为研究明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当时的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是这一时期银锭发展的历史见证。

三、明晚期

编号 JC 银 8，明晚期银锭（图五），来源不详。通长 54、通宽 37 、通高 25mm，重 172.27 g，银锭呈船形，两端起矮翘，锭面为弧首束腰状，锭体较厚，丝纹清晰均匀，银锭外部表面分布浅凹坑，并有密集的蜂窝孔洞。银锭的造型规整，转折明显，蜂窝孔分布自然。明末银锭造型由明中期锭体较为纤细变为厚重，两端的起翘变短，银锭的造型已基本接近清代，这件银锭虽小，但具有明晚期的典型特征，是明晚期银锭的典型代表。



图五　编号 JC 银 8 明晚期银锭



图六　1986 年澄江镇房产公司工地出土银锭

江阴博物馆另有两批明晚期小银锭，一批为 1986 年澄江镇房产公司工地出土（图六），一批为 1987 年江阴峭岐镇出土，出土时资料不全，

可能出土于窖藏或遗址。这两批银锭的基本形制为船形，锭面一部分为弧首束腰形，但束腰不太明显，一部分已不见束腰而呈椭圆形，银锭表面均有清晰的丝纹，但丝纹不太均匀，深浅不一，银锭外部表面均有深浅不一的凹坑，并伴有少量的蜂窝孔，大的银锭重约 200 g 左右，约六七两，最小的重约 40 g，约为一两有余。这两批小银锭形制不规整，做工较为粗糙，大小亦不均匀，银两的成色也较普通，是明晚期民间常用的小银锭。

明代中期以后白银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货币。明万历年间，政府推行赋役改革，合并征收赋银和役银，俗称“一条鞭法”，纳税人用白银向国家支付税款，对确立银锭法定货币地位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白银流通数量不断增加，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大宗交易、日常用品皆以白银计价，此时的白银已成为流通中最重要的货币。白银的大量使用，使得民间私铸银两作坊大增，所铸银两的质量良莠不齐，大量形制不规整、成色不一的银两广为流通，特别是小银两尤甚，象江阴博物馆的这两批小银锭应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的。

四、清代咸丰七年银元宝

编号出 89–17，清咸丰七年银元宝（图七），通长 115、通宽 70、通高 84mm 、重 1870 g，1989 年江阴市云亭镇陈家村农民在建房挖地基时挖出。

银锭为马蹄形，两端向上起翘，锭面为椭圆形，锭面磨平，戳印纵向两道铭文，右侧“咸丰七年五月”，左侧“襄垣县佘蔚宗”，起翘部分的内侧见丝纹，银锭外部侧面有凹坑，侧面底部和锭底分布有较多的蜂窝孔。清代银锭形制基本沿袭明末形制，略有差别，锭体更加厚重，锭面基本为椭圆形，大部分锭面的丝纹经过磨平，银锭上的铭文由錾刻铭文变为戳印铭文。

清代银锭的种类，比明代大大增多，有船形、方形、圆形等等，使用最多的仍然是船形银元宝，这种银锭因整体形如马蹄，故又称马蹄银，五十两马蹄银是清代最为常见的银锭，锭面上一般都会戳印地域、年份、工匠等铭文。象这件银锭就戳印了铭文，“咸丰七年五月”是银锭的制作时间，“襄垣县佘蔚宗”是制作银锭的工匠名字。襄垣县现隶属于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是清代铸造银锭的地点。清代中晚期，私人设立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盛行，以山西票号最为著名，票号业务遍布全国，铸造银锭也是票号的业



图七　编号出 89–17 清咸丰七年银元宝

务之一，所以山西银锭在全国享有盛誉。山西银锭铸造地点也很多，长治和襄垣就是其中之一。山西银锭绝大多数是五十两大锭，成色尚佳，象这种戳印纪年、县名、银匠等铭文的银锭基本是用于上缴国库的。

清代白银在流通中处于主要地位，清前期，以银锭为主，嘉庆以后，外国银元在中国广为流通，已成为中国的通用货币，当时是银元与银两并行使用。但银元使用起来比银锭方便很多，作为称量货币的银锭在流通过程中渐渐式微，最终在1933年，随着民国政府，废两改元法令的颁布，银锭正式退出流通领域。

注释：

［1］邬红梅、刁文伟《江苏江阴出土大明通行宝钞》《中国钱币》2005年第4期

（作者：江阴市博物馆保管科研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江阴古城布局复原研究

◎黄一哲

一、前言

江阴故城位于今江苏省江阴市城区。江阴市位于太湖平原，北望靖江，南接无锡，西接常州，东邻张家港（图一）。全市占地 987 平方公里，地势平坦，以平原为主，平均海拔约 6 米。中部及东北部有零星低丘分布，这些丘陵使长江干流向北改道，因此江阴地区成陆较早且稳定[1]。

江阴北临长江，南接太湖，区内水网密布，土壤肥沃，适宜人类耕作。也因得长江天险，成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例如 1949 年的渡江战役，反映的就是国共双方对长江沿线的争夺。再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九》[2]中所载陈建的评价：“当士诚北有淮、泗，南据浙西，江阴、长兴皆要害



图一　江阴地理位置卫星图[3]

也。长兴据太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之要冲。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而窥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溯大江而上金焦。”

有关江阴古城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地方志书则有明嘉靖赵锦修《江阴县志》21 卷、明崇祯冯士仁修《江阴县志》8 卷，清道光陈延恩修《江阴县志》28 卷，清光绪卢思诚修《江阴县志》30 卷，民国陈思修《江阴县续志》28 卷，以及近人所修《江阴市志》。

有关江阴古城的考古资料则十分匮乏。目前仅见南京博物院在 2015 年对江苏明清海防遗存的相关调查[4]。

因此，本文主要依凭文献材料，大致做以下三个工作：一是梳理江阴地区和江阴故城的建置沿革，以了解江阴故城的发展脉络；二是采取从晚到早的方式，以地方志书为基本资料，对明清时期的江阴城进行城市布局的复原，具体而言，以光绪《江阴县志》[5]为主要资料对清代江阴城的布局进行复原研究，以嘉靖《江阴县志》[6]为主要资料对明代江阴城的布局进行复原研究；三是对文庙（县学）这一重要公共建筑群，进行范围和布局的复原研究。

二、建置沿革

1.史前时期

江阴地区成路较早，因此从马家浜文化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江阴地区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点，包括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祁头山遗址，崧泽时期的龙爪墩遗址、南楼遗址，良渚时期的高城墩遗址等[7]。这反映了江阴地区人类活动的连续性，以及先民活动范围沿长江扩散的现象。

2.夏商周时期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夏属扬州。商属扬州，吴泰伯立，隶句吴。周隶扬州之句吴，是为延陵以封季札。越灭吴延陵属越。楚灭越延陵属楚以为春申邑。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有佘城城址、花山遗址、曹家墩遗址等[8]。俞伟超先生就曾探讨佘城遗址为太伯奔吴之地的可能性[9]。但总体而言，文献对夏商周时期地域的记载过于宽泛，因此这些细节的地点问题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3.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秦灭楚，置会稽郡以延陵为乡……汉平秦，取会稽郡，改延陵乡为毘陵县，析延陵之地为乡属之，是为暨阳乡……咸康七年罢暨阳盐署，立南沙县。

江阴地区秦时属会稽郡延陵乡，汉时为毘陵县暨阳乡，西晋时为晋陵郡阳盐署，东晋时为晋陵郡南沙县。

4.南北朝时期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梁废暨阳县，置江阴郡，徙治君山之阳，分兰陵县地，置江阴县，割兰陵郡之利城县，并置梁丰县于暨阳之墟以属之……及萧梁置郡，而江阴、利城、梁丰三县皆属焉。江阴之名始于此……陈永定元年，废梁主方智为江阴王，以郡为江阴国。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四册常州府二》[10]：江阴故城，陈书本纪，永定元年，以江阴郡奉梁主为王。

南朝萧梁置江阴郡，江阴之名始于此。江阴故城也始筑于此时。梁时依此为江阴国。

5.隋唐宋时期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隋平陈，国除，开皇九年，省江阴郡并利城、梁丰入江阴县，仍徙治于君山之阳，隶常州……唐兴仍改为常州……会昌四年升县为望……南唐以县置江阴军……宋淳化元年，军废，三年复置之。

另见光绪《江阴县志卷一》：梁古城置江阴郡县……陈隋唐因之。南唐改县为军，曰军城。徙而稍西约一里许……宋增子城门四。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四册常州府二》：县城，唐天佑十年杨吴所筑。周十三里有奇。北濒临大江，内有子城。宋庆元五年重修，元毁。

隋唐时期，江阴为县，隶属常州。南唐为江阴军。宋代时为军，时又废军为县，仍隶属常州。

隋唐江阴城因袭南朝。南唐时将城向西扩建，有子城，周十三里有奇。宋时因袭南唐建制。

6.元明清时期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元至元十三年，升军为路总管府。二十八年降路为州，隶常州路，寻以州为上州，隶江浙行中书省……明取江阴州，改为连洋州，洪武元年复改为江阴州，二年改州为县……国朝为县如故仍以常州府领之。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江阴故城，在今县治东北。祥符图经，城周十三里，北濒大江，杨吴天佑十年所筑，内为子城。宋庆元五年重修。元初毁。至正十二年盗起，城邑残破。十四年为张士诚将黄传所据。又三年，明师克之，初筑土城。龙凤十二年，以砖石，周九里有奇。嘉靖中，复增筑。

江阴在元代时先为路总管府，后为州属常州路，最后为上州属江浙行中书省。在明清两代则为江阴县，隶属常州府。

江阴古城于元初毁，又于至正年间，在原江阴城旧址重建，初为土城，周九里。后经明清两代不断加筑修缮，规模未变。

7.民国时期

依《江阴市志卷一》[11]所记，民国年间，江阴县先属江苏都督府，后属江苏省。

江阴古城城墙则在民国 34 年开始拆除，至民国 38 年，东南、西南、东北部分城墙被拆。直到解放后 1956 年，城墙被彻底拆除。

依据上文的梳理，可将江阴故城的规模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南朝至唐末。南朝梁时建城，隋唐因袭之。

第二阶段为南唐至宋元之际。南唐时将城向西扩建，周十三里，又建有子城，宋因袭之，直至元初被毁。

第三阶段为元至民国。元至正年间重筑土城，周九里，明清两代不断修缮。直至民国 34 年开始拆毁。

三、清代江阴城的复原研究

目前可见最晚的县志为民国九年刊本的《江阴县志》。但该县志内容多从光绪《江阴县志》，图文的详细程度也远逊。且根据上文对江阴城建置沿革的梳理，城墙的拆除要晚至民国34年。也就是说民国初年江阴城的整体范围与清代一致。因此本文以清代江阴城的复原为起点进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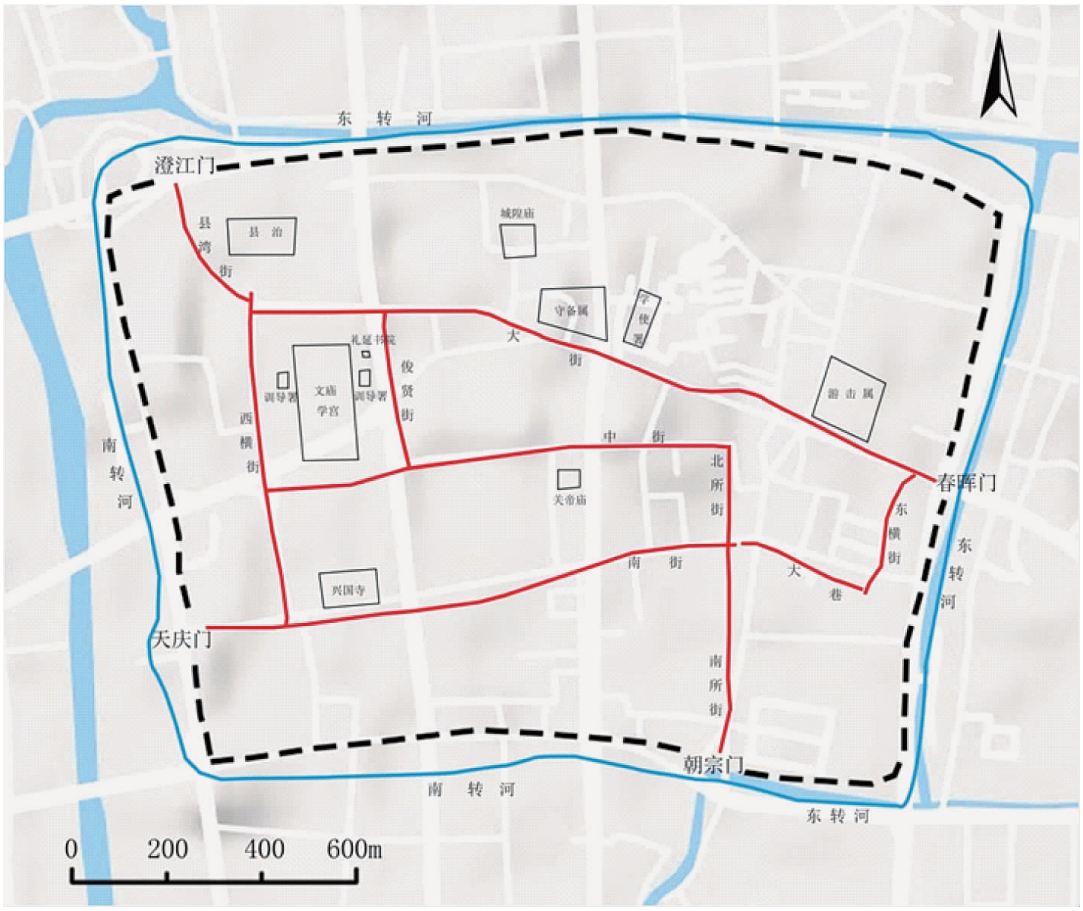
清代县志又有道光年间的28卷本和光绪年间的30卷本，本文取图文内容更详实的光绪本为古城复原的主要参考资料（图二）。

另根据《江阴市志卷五》所载：解放后，1952年9月始拆城墙，至1956年基本拆除，城基植树绿化。嗣后，东门至南门，刘伶巷、塔南路南沿城基渐为建房所用，其余拓宽为环城路。

可见，今环城路即为江阴古城城墙所在。因此本文以谷歌地形图为底图，以四条环城路作为城墙的大致范围，对古城进行布局复原研



图二　清代江阴县城隍图



图三　清代江阴故城布局复原图

究（图三）。

1.城墙、城门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四册常州府一》：江阴县城，周九里有奇，高二丈五尺，门四，池广四丈二尺，深七尺，明正中筑。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宋增子城门四，东曰新津、南曰观风、西曰望京、北曰澄江，外城门五，东曰春晖、西曰天庆、南曰朝宗、北曰爱日、东北曰建寅……元定江南，尽废城郭……明龙凤三年，增筑土城甃砖石，加女墙，周九里三十步，高一丈五尺，四门仍旧名，曰春晖、天庆、朝宗、爱日……（正德）三十三年，知县金柱合四城而甓之，高二丈二尺，四周长一千三百九十六丈一尺计九里十三步，改北门为澄江门……国朝顺治二年，大兵南下，东南北各倾圮数十丈，县丞卞化龙修之。雍正十三年，知县蔡澍请发帑，重葺城高二丈五尺，宽五尺，城顶四尺，周九里十三步，计一千六百八十七丈三尺，城楼四座，角楼四座，窝铺十六座，水关三座，大城门四座，小城门四座。乾隆五十四年，知县牛兆奎修澄江门城楼。嘉庆五年，知县单渥通葺。道光二十五年，知县

金咸大修。咸丰十年，粤匪窜踞。至同治二年，淮湘水陆军克复江阴县，炮毁东北隅城垣数十丈。

宋元之际，江阴城郭尽废，后经元明清三代多次修缮，但城墙规模保持不变。雍正十三年后的江阴城布局为：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环水。城墙周围九里十三步，有城门四座，北门为澄江门、南门朝宗门、东门春晖门，西门天庆门。此外还有城楼、角楼、窝铺、水关、小城门（瓮城城门）等附属设施。

2.城壕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外城河自南外陈家桥，过永安桥，循城西流，历天庆门，转而北至龙须河口，曰南转河。自南外米行桥，循城东流，转而北历春晖门又折而西至澄江门，曰东转河，两转河长二千二百九十二丈七尺。

另见《江阴市志卷五》：70 年代，南转河自平冠桥以西全部填没，惟东转河屡经拓浚，至今畅通。

可见自南门西流，然后沿西城墙北折的这部分称为南转河，今已淤。自南门东流，后沿东城墙北折，再后沿北城墙西折的这部分为东转河，今称东横河。

3.街道

光绪《江阴县志卷二》：县前街、西横街县治鼓楼南为暨阳古邑坊，自坊南出至善政桥曰县前街，过桥而南达南街曰西横街……县湾街，县治春申旧封坊西北转，至澄江门曰县湾街……大街，暨阳古邑坊左转而东为延陵故里坊，坊东直达春晖门曰大街……中街，西横街中折而东至花桥南堍曰中街……南街，西横街南尽处西折至天庆门东折至市口曰南街……东横街，进春晖门数十步折而南至财帛司庙之故址曰东横街……贤俊街，即鸿渐街，俗名新街，由中街学宫之东而北折过鸿渐桥，又过文亨桥达大街曰贤俊街……南锁巷，进朝宗门北行至市口曰南锁巷前明岁贡子鲚，有腌晒所，故又称南所巷。北锁巷，自市口北至中街，曰北锁巷，巷北口有古井相传井中有铁索上有铁锁因名……大巷，市桥东至财帛司庙故址曰大巷。

江阴古城街巷较多。东西向主干道有三：北边的大街（今为西大街、司马街、人民中路），中间的中街（今中街，西段不存），南边的南街（今南街）和大巷（今不存）。南北向主干道有四：西边西横街（今西横街）和县湾街（今不存），中偏西的贤俊街（今人民中路与南街之间的虹桥南路路段），中偏东的南所巷、北所巷（今南所巷不存，北所巷仍在），东边的东横街（今不存）。

其中又以东西向的三条主干道为主。南北向的街巷相对较短，起连通城门与东西向主干道的作用，也与城内的诸多水系相结合，有细分区域的意义。

4.官署

（1）学使署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学使署。在大街虹桥东，旧为巡抚行台。

学使署在江阴城中部偏北处，今为中山公园。

（2）县治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南唐江阴军治在城

西北隅，即今之县治也。自杨吴改筑江阴城，南唐因徙治于此。

自南唐以来，县治位置就一直沿革未变，位于城西北角。今为居民小区。

（3）其他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县丞署在县堂之东……典史署在县丞署之左……教谕训导署在学宫东西……游击署在大街高巷东……守备署在大街虹桥西。

县丞署、典史属皆位于县治附近，可视为县治的组成部分。

教谕训导署位于学宫两侧，可视为学宫的组成部分。

游击属、守备属位于大街北侧。游击属近东门，今为商场。守备属位于学使属西，今为江阴市中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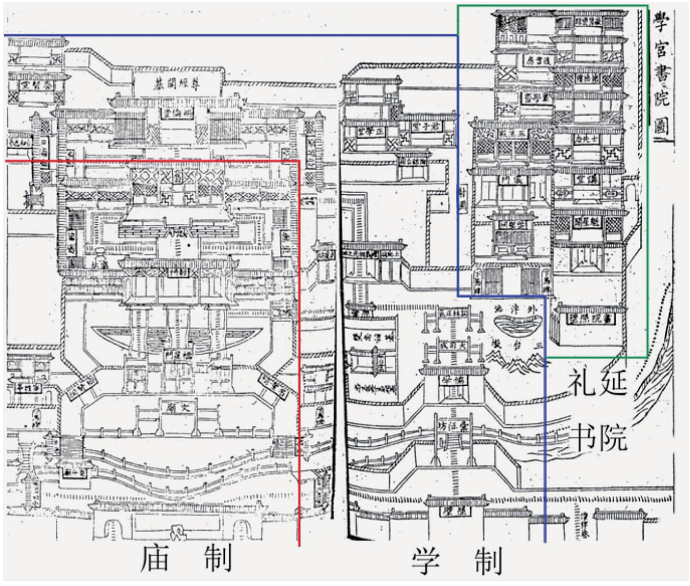
5.学校

（1）县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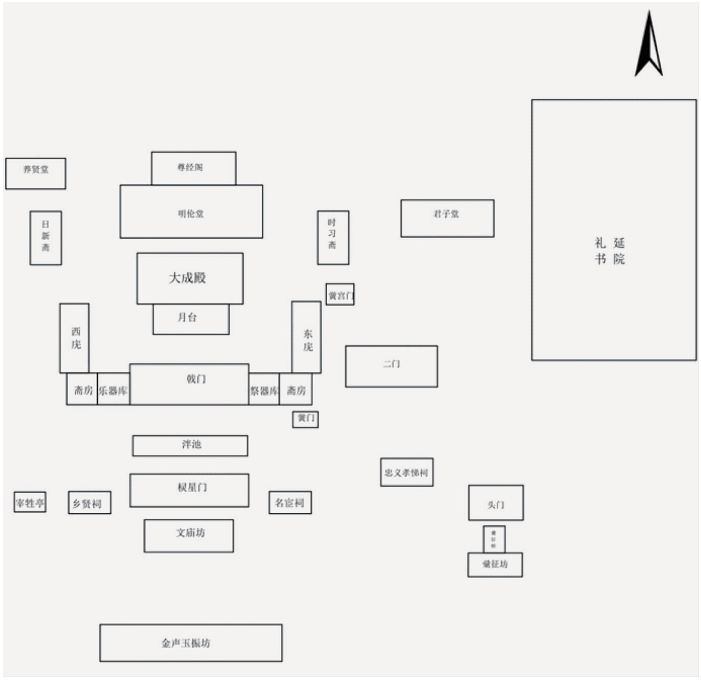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四册常州府一》：江阴县学，在县治西南，宋崇宁间建，本朝顺治年间屡修，入学额数二十五名。

光绪《江阴县志卷五》：明江阴侯吴良因故址创立庙学。洪武三年，知县吴志远重修。十五年，知县王衡教谕郑江建讲堂于庙左。二十六年，教谕蔡永升、县丞贺子徽议为左庙右学，乃更建于讲堂址，而以庙址为明伦堂……国朝鼎新值明季兵燹后，自大成殿、明伦堂外俱榛芜不治……光绪元年，庙工续竣建。大成殿及左右旁廊，东西两庑，祭器乐器房、名宦、乡贤两祠，宰牲亭，文庙坊……又续建崇圣祠、正殿而后规模始备，祀事孔明矣。

江阴县学（也称文庙、学宫）位于县治西南，今仍为文庙。其左庙右学的基本布局成型于明洪武年间（图四）。明清之际，毁于战乱。经有清一代不断修缮，于光绪年间恢复庙制学制。



图四　清代江阴县学图



图五　清代江阴县学布局复原图

庙制以大成殿为中心，以金声玉振坊为南端，大成殿为北端，成轴对称布局（图五）：

大成殿，坐北朝南，用以供奉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塑像。三间。殿前为月台。

两庑，大成殿东西两侧。各七间。

戟门，位于月台前，也称大成门。三间。戟门旁东为祭器库，西为乐器库。

斋房，位于戟门左右翼，文武官斋房各四间。

泮池，位于戟门前，池上有桥三座。

棂星门，位于泮池前。三间。

名宦祠、乡贤祠，位于棂星门左、右。三间。

宰牲亭，位于乡贤祠南。三间。

文庙坊，位于棂星门前。文庙坊前为玉带河。

金声玉振坊，位于玉带河南。

黉门，位于戟门东侧，即侧门，为文武官下车马处。

学制整体位于庙制东侧和北侧：

彙征坊，位于文庙坊东，玉带河北，是整个学制的北端。

彙征桥，位于彙征坊北，桥跨玉带河。

头门，位于彙征桥北，门上有榜，榜上题“儒学”二字。三间。

忠义孝悌祠，位于头门西。

二门，忠义孝悌祠北。三间，中间为门，上题“禮義相先之地”。东间为土地祠，西间为城隍祠。

黉宫门，入二门向北而后西折，位于大成殿左翼门外东。联结学制和庙制建筑。

明伦堂，位于大成殿后，三间。为讲学、

行礼、丁祭、习仪之处。

尊经阁，位于明伦堂后，上下五间。

时习斋，位于明伦堂东。三间。

日新斋，位于明伦堂西。三间。

君子堂，位于时习斋东。三间。

养贤堂，位于日新斋西。三间。

(2) 礼延书院

光绪《江阴县志卷五》：暨阳书院，在学宫左……乾隆三年，知县蔡澍请于督学使者就东城栖霞精舍稍建，书寮延山长主讲席仍额曰澄江，从古也……同治十一年……易名礼延。

礼延书院，也称暨阳书院，紧临县学，位于其东侧。

6.祠庙

江阴城内还有众多祠庙，除了上文提到的，属于县学的文庙外，比较重要的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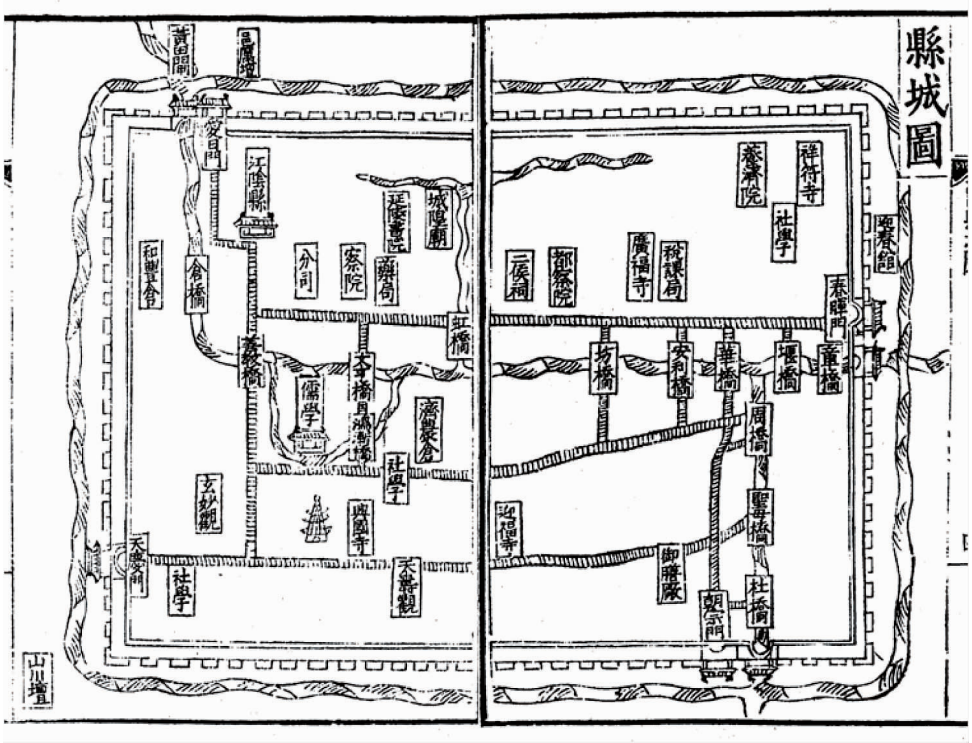
关帝庙，也称武庙，位于布政坊巷西。今布政坊巷仍存，而武庙不存。

城隍庙，在大街中段北侧。今为庙巷新村居民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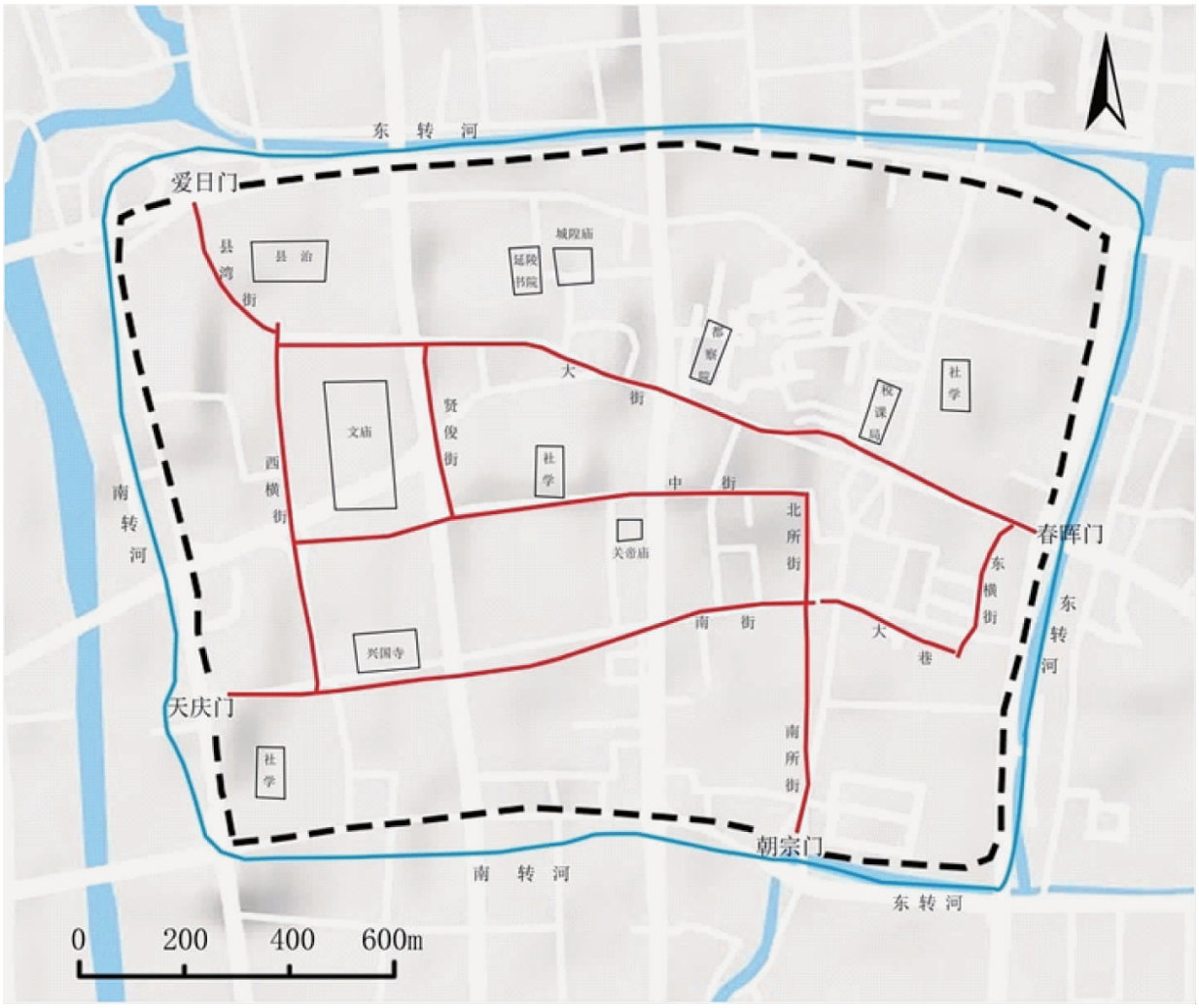
兴国寺，西横街东侧，南街北侧。即今兴国寺。

四、明代江阴城的复原研究

明代县志有嘉靖年间的 21 卷本和崇祯年间的 8 卷本，本文取图文内容更详实的嘉靖本（图六），为明代城复原的主要参考资料（图



图六　明代江阴县城图



图七　明代江阴故城布局复原图

七）。

1.城墙、城门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一》：明兴龙凤三年，更加修筑，甃砖迭石，增女墙，辟四门，仍旧名东曰春晖、西曰天庆、南曰朝宗、北曰爱日。岁久而夷如履平地。正德元年，知县刘纮始修朝宗、天庆二门。六年，知县王鈵复哀民力畚土筑之城，还其旧周九里零，高一丈五尺基厚，如之女墙高二尺五寸，自东门至南门三百零七丈五尺八寸，南门至西门三百七十四丈六尺，西门至北门三百零六丈三尺，北门至东门六百九十六丈八尺，总计一千六百八十七丈零三寸，为六千七百四十九步……（嘉靖）二十二年，巡江御史冯璋计久远得赎钱若干，厚培城趾，迭石五层，凡六百八十五丈，甃砖为面凡得四十余丈，其功骎骎乎起矣。

根据上文以及对清代江阴城的复原，可知清代城墙为直接继承明代城墙而来。因此明代城墙也是呈长方体，周九里十三步。有城门四座，北门为爱日门（清为澄江门）、南门朝宗门、东门春晖门，西门天庆门。

2.城壕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一》：城之内黄田河贯其中，江潮自北南注转而东，又自东而南直趋朝宗门城之外为濠，阔四丈二尺，深七尺，自澄江门循城西流转而南至朝宗门是为南转河，自澄江门循城东流转而南又折而西至朝宗门是为东转河，即今所谓城濠也。

明城壕与清城壕范围一致，皆称南转河、东转河。

3.街道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二》：县湾街，出县治而西转至澄江门……大街，悦来坊至春晖门……中街，西横街中折而东至华桥……南街，西横街南西折至天庆门，东折至市口……东横街，章桥南至城……贤俊街，文亨桥南至中街……北鑊巷，市口北至中街……南鑊巷，市口南至朝宗门……大巷，圣母桥东至烈女庙。

明江阴城街道被清代沿用，因此两者布局相同。三条东西向主干道，大街、中街、南街。以及将东西向主干道与南北城门连接的南北向街巷，包括县湾街、西横街、东横街、贤俊街、北鑊巷、南鑊巷、大巷。

4.官署

（1）县治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二》：县治在城西北隅。

县治位于城西北，清代仍为县治。

（2）税课局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二》：税课局在安利桥北。

税课局位于城东北，大街东北。与清代游击属的范围大致重合。

（3）巡抚行台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二》：巡抚行台在大街虹桥东，扁曰都察院。

巡抚行台，又称都察院。位于城中北部，在税课局西。与清代学使署的范围大致重合。

5.学校

（1）庙学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七》：国朝丁酉年江阴侯吴良镇守因故址创立庙学。……（洪武）二十六年，教谕蔡永升、丞贺子徽议为左庙右学，乃更建于讲堂址而以庙址为明伦堂……正德二年，知县刘纮复修之易敝鼎新崇高辟隘，由是庙学大治。外为石坊门，入为棂星门，又入为泮池，池上架石为桥者三穿为九洞桥，北为戟门，左右为两翼，戟门北中为正殿，殿前为月台，殿东西为两庑，西庑之右南向为祭器库，东向为刑牲所，是谓庙制。并庙门而东为儒林坊，入为学门，循东墙踰桥西折而北为二门，曰礼义相先之地，又折而西为正尔容门，由门循庙而北，正中为明伦堂，堂后为奎文阁，堂东为时习斋，西为日新斋，斋左右翼以号楼，由时习斋入南向为君子堂，由日新斋入南向为养贤堂，堂南为廪。由正尔容门出而东为教谕

廨，君子堂后为训导东廨，后为训导西廨，并教谕廨而东为射圃，有堂曰观德庙。门之东为名宦祠，又东为兴贤坊，西为乡贤祠，又西为育俊坊，是谓学制。合庙学周垣凡四百五十八丈九尺。

庙学，也称儒学，也就是清代的学宫、县学、文庙，今仍为文庙。其左庙右学的布局也为清代所延续。

庙制以大成殿为中心，呈轴对称分布（图八）：

大成殿，位于庙制中轴线的北端，坐北朝南。

月台，位于大成殿前。

两庑，位于大成殿东西两侧。

祭器库，位于西庑西侧，南向。

刑牲所，位于西庑西侧，东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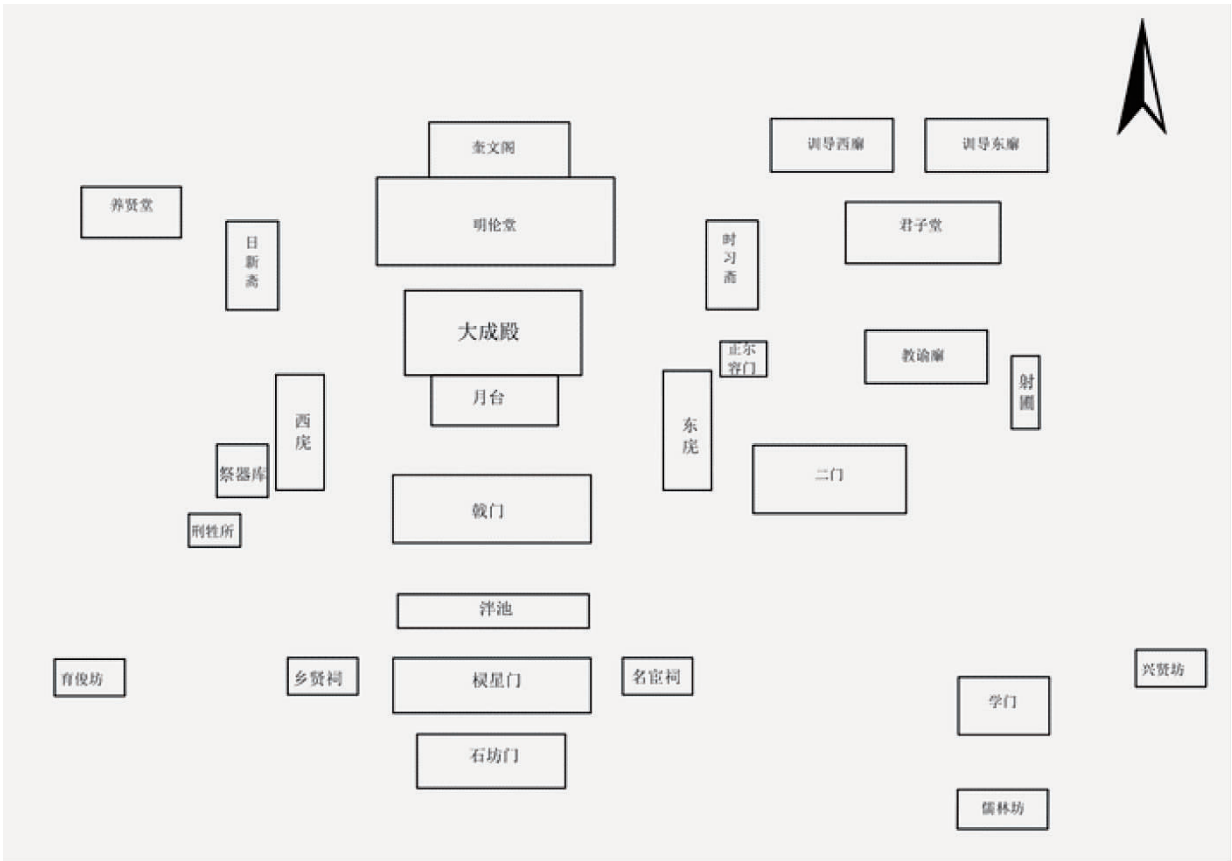
戟门，位于月台南。

泮池，位于戟门南，池上三座石桥。

棂星门，位于泮池南。

石坊门，位于棂星门南，是庙制中轴线的南端。

学制位于庙制东侧和北侧：



图八　明代江阴县学布局复原图

儒林坊，位于石坊门东侧，是学制的南端。

学门，位于儒林坊北。

二门，位于学门西北。

正尔容门，位于二门西北。

明伦堂，位于正尔容门西，大成殿北。

奎文阁，位于明伦堂北。

时习斋、日新斋，位于明伦堂东西两侧。

养贤堂，位于日新斋西，南向。

君子堂，位于时习斋东，南向。

教谕廨，位于正尔容门东。

训导东廨、训导西廨，位于君子堂北。

射圃，位于教谕廨东。

名宦祠，位于棂星门东。

兴贤坊，位于名宦祠东。

乡贤祠，位于棂星门西。

育俊坊，位于乡贤祠西。

(2) 社学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七》：养正书馆在儒学东中街北……东门社学在县治东隅里仁坊……西门社学在县治西南天庆门内。

养正书馆，位于县学东南，大街北。清代不存。

东门社学，位于东门西北。清代不存。

西门社学，位于西门东侧。清代不存。

(3) 书院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七》：延陵书院在县治东，城隍庙右。

延陵书院，位于城中北。清代不存。

6.祠庙

结合嘉靖《江阴县志卷之八》和明代江阴县城图，可复原位置的祠庙有：

城隍庙，位于城中北，县治东。清代仍为城隍庙。

关将军庙，即关帝庙、武庙，位于城中部。清代仍为关帝庙。

五、总结

本文复原了明清江阴城内主要街道和建筑的布局情况，此外还有诸多城内小巷、祠堂、仓库、民房等，城外社坛、防御设施等，限于资料有限，无法一一复原。

仅从已复原的情况出发，可以发现明清两代江阴城内的布局有一定规律。官署集中在城北，文庙居于城中，城南为居民区，祠堂、仓库等零星分布于城内各处。

整体而言，明清两代江阴城的布局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明代的城墙、城门、街道、官署等多为清代修缮和继续利用。变化多在于名称的转变，如北门由爱日门改称澄江门，再如明代税课局改为清代游击署，明代都察院改为清代学使署等。

变化较大的是学校的分布。明代县学位于城中偏西，此外在城中、东门、西门各处还分布有社学、书院。清代县学位置不变，但原先分散于各处的书院也都集中到县学附近。换言之，学校在明代江阴故城呈分散分布，在清代则为集中分布。

北临长江的地理环境使江阴历代以来皆为军事要地，城北郊的诸多城防措施，城北集中

分布的官署，皆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除了兵乱，明代以来倭寇流贼的侵袭也是江阴故城重视防御的重要原因。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一》就有“流贼渡江寇城下，居民赖以保障”的记载。当然，北有长江、南有太湖的地形优势，也使得江阴自古以来就拥有发展港口贸易的先天资源，城北门黄田港的开凿也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然而囿于明清两代兵灾寇乱不断，江阴古城也处在不断地破坏和重建之中。

参考文献：

[1] 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页 9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3] 南京博物院：《祁头山》，图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

[4] 周润垦、高伟、王清爽、孙亮、邬俊、张敏、骆琳：《江苏明清海防遗存调查报告》，《东南文化》，2017 年 06 期，页 39–49。

[5] 卢思诚、季念诒：《光绪江阴县志》，清光绪四年刻本。

[6] 赵锦、张衮：《嘉靖江阴县志》，明嘉靖刻本。

[7] 翁雪花：《试论江阴史前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史前研究》，2010 年 00 期，页 118–121。

[8] 江苏佘城遗址联合考古队：《江阴佘城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01 年 09 期，页 33–40；江苏花山遗址联合考古队：《江阴花山夏商文化遗址》，《东南文化》，2001 年 09 期，页 17–32；高振威、周利宁：《江阴周庄镇曹家墩发掘简报》，《江阴文博》，2011 年 01 期，页 2–14。

[9] 俞伟超：《江阴佘城城址的发现与早期吴文化的探索》，《古史的考古学探索》，页 177–180，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

[10] 仁宗敕：《嘉庆重修一统志》第四册，上海：上海书店，1984 年。

[11] 江苏省江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阴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作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馆藏服饰文物整理侧记

◎钱晓洁　陈龙

衣冠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它的产生和演变，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以及宗教信仰、生活习俗都有密切关系，体现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与人们情感的宣泄，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决定下的审美意识。

江阴博物馆自建馆以来，出土、征集了许多服饰文物，其中主要包括陆桥陆氏家族墓、磨盘墩承氏家族墓、云亭薛氏墓、鸡笼山明墓等墓葬中出土的服饰，以及金武祥后裔捐赠的一批清代民国服饰。这些服饰文物是我们研究明清服饰演变、织物材料、葬俗制度和名人研究的重要实物依据。一直以来，由于库房柜架条件限制，这些服饰文物的整理存放存在着一些问题。2019 年我馆实施了“馆藏珍贵文物保存环境质量监控与柜架囊匣”项目，专程赴杭州丝绸博物馆等处对服饰文物的整理存放进行了考察调研，结合本馆实际情况，对我馆服饰文物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柜架设计定制。于此项工作做如下梳理：

一、整理前的存放状况及存在问题

1 、存放状况

由于服饰文物的尺寸大小不一、入馆时间不同，存放的方式也不同。一部分经修复后的服饰折叠装入牛皮纸袋后存放于柜架中(图 1)，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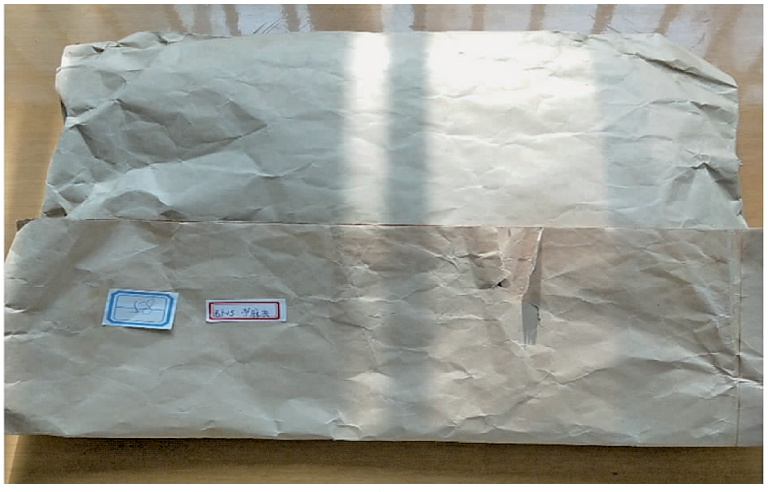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图 3

分用透明塑封袋存放(图 2)，还有一部分体积较大的衣裙、布料等用塑料袋包裹后存放于柜架中，极个别的例如皮靴等则直接摆放于柜架中。

2、存在问题

首先，折叠、堆放会使衣物褶皱，部分可能产生粘连，长期折叠会留下许多折痕（图 3），服饰纤维容易被折断，久而久之会造成藏品损坏。其次，装衣物的纸袋容易破损和酸化，会对文物产生不良影响。第三，新旧服饰文物的混放还会造成交叉污染或褪色。另外，之前的标签是涂了浆糊粘在服饰上，时间久后容易脱落、招蛀，文物也会因此受到污损（图 4）。



图 4



图 5

为了进行更好的保护与存放，我馆在库房新增了一批服饰类文物专用的存储柜架（图 5），期间曾赴中国丝绸博物馆交流考察，并不断与柜架制作单位沟通、修改。柜架上层为对开门，可用来放置各类规格的无酸装具盒，下层为抽屉，用来放置大件衣物,柜体稳定坚固，抽屉使用灵活可靠。

二、整理过程

1、整理前的准备。⑴整理前先核对服饰清单与原始登记账册，找到相对应的文物来源，看是否有遗漏，缺少的加入清单中，按照出土年份重新整理清单。⑵将所有服饰文物全部下架，按照原始编号查找文物出土年份和来源，同一墓葬的归为一类，根据原始编号顺序初步排序。⑶重新制作吊牌标签，标签上注明文物原始编号、文物名称、规格尺寸和其他基本信息（图 6）。使用这种吊牌标签，既方便填写又易于悬挂、不易丢失，且不需要使用浆糊或者不干胶等黏贴，避免污染文物。

2、整理流程。按照清单上的编号找到相对应的文物,比对文物名称、规格尺寸与实际藏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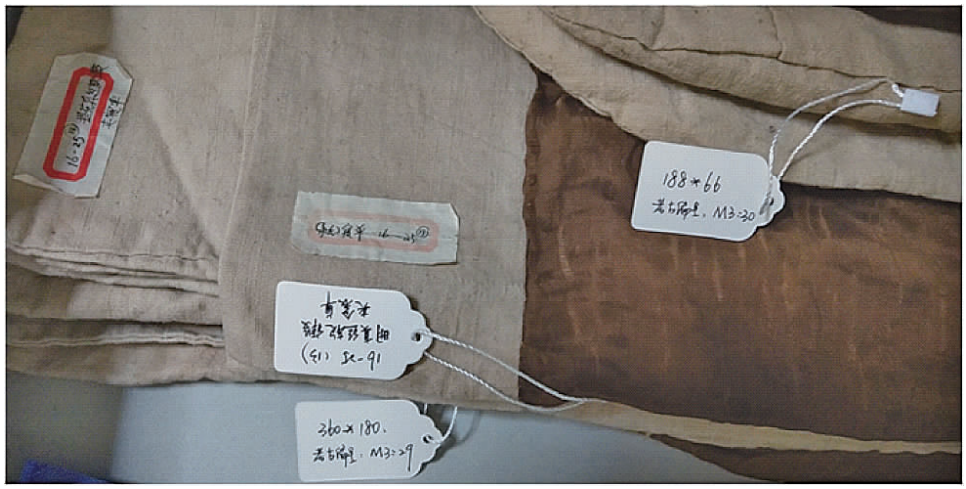


图 6

否相符，确认无误后，将服饰按年份、编号顺序存放于抽屉中，挂上新制作的标签，标签上备注文物的基本情况，同一来源的归放在一个位置，以便查用（图7）。全部整理完成后，根据实际整理情况修改、补充清单内容，填写新的存放方位，将遇到的问题在清单上一一体现。



图 7

3、出现的问题。⑴由于许多服饰入藏时间较早，许多标签已经脱落，又因为之前的服饰没有固定的装具，使脱落的标签混放在一起，无法确认文物的原始编号和名称。⑵同一件文物有两个不同的编号，且两个编号不属于同一墓葬出土。⑶个别文物实物与清单上的名称明显不符，例如：清单上的文物名称为“百褶裙”，对应的服饰为“白棉布裤”。⑷一部分藏品没有入库记录，查不到文物来源。

4、解决方法。文物与清单名称明显不符的，核对考古报告后在标签上标明文物的实际名称。将所有信息明确的服饰文物整理出来，在剩余的服饰中，挑选出特征明显的。或是某些服饰的颜色、纹饰、式样和材质等与某个墓葬的文物明显相同，依据考古报告上的尺寸、图片等介绍信息进行比对，若相符，则在标签上注明比对过后的文物名称，做相应的情况说明。最后将没有来源的文物归为一类，按照编号顺序折叠存放于无酸盒中，以便日后核查。

三、整理后的文物存放状况

对于比较宽大且厚重的衣服，如长裙、长袍等，一层抽屉一般只放一到两件，以减少对服饰的挤压。衣服基本是展开平铺在抽屉里，每层抽屉底部放一块无酸纸板，两边带有拉绳用来提起纸板，将衣物铺在纸板上。提用服饰时，可以直接提着无酸纸板将衣物拿出、放回（图8），这样可以减少对服饰的触碰次数。对于比较轻薄平整的衣物，层层平铺在同一抽屉以



图 8



图 9

节省空间，每层衣服之间以无酸纸隔开（图 9）。还有一部分棉麻布料折叠平整后按照编号装入无酸装具盒中，鞋子、帽子、配饰等根据不同的材质和种类分别放入无酸装具盒中（图 10）。各个无酸盒放于柜架上层的双开门内，每只无酸盒上标有文物的编号和名称，方便核对和查



图 10

找（图 11、12），每层抽屉和无酸盒内放有吸湿炭包和防霉驱杀虫灵（图 13）。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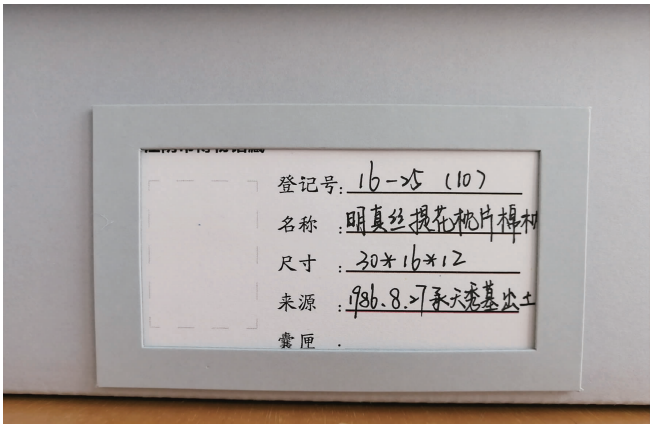


图 12

四、总结

藏品的损坏，并非某一种因素单独导致的，而常常是几种因素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文物保护工作应以预防为主。藏品管理是博物馆库房保管的中心环节，它是延长藏品寿命的关键，藏品入库后，如不进行妥善保管，势必会加快藏品的自然损坏速度，所以一定要为藏品营造良好的储存环境，将不利因素降到最低。

（作者：江阴市博物馆保管科研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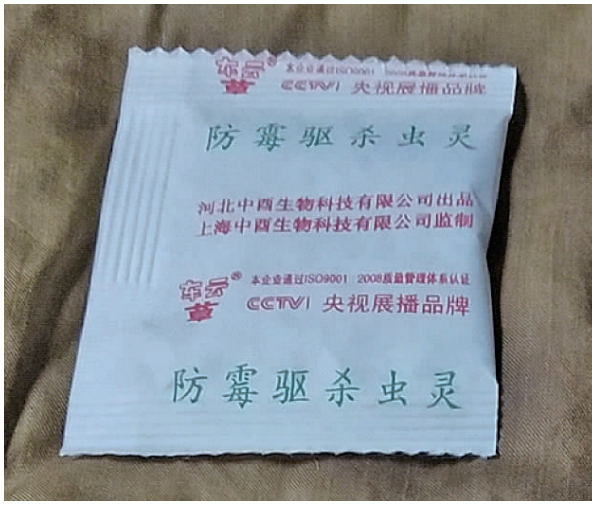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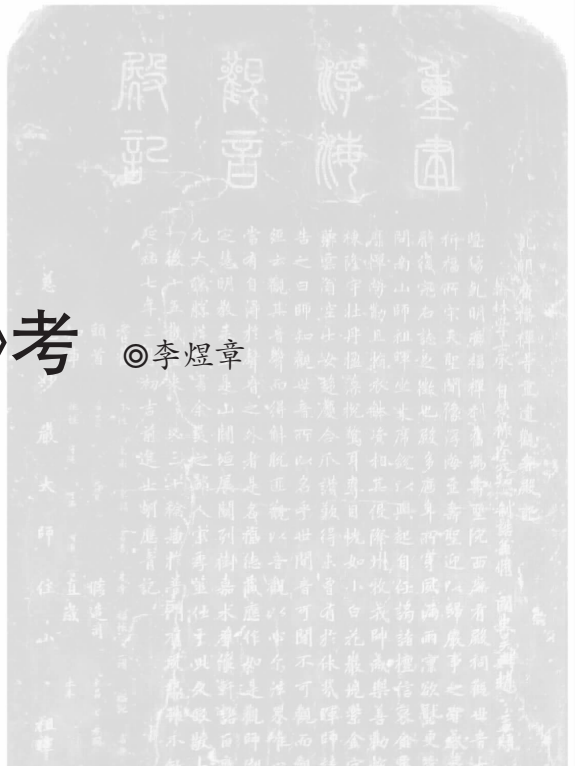


图 13



《重建浮海观音殿记》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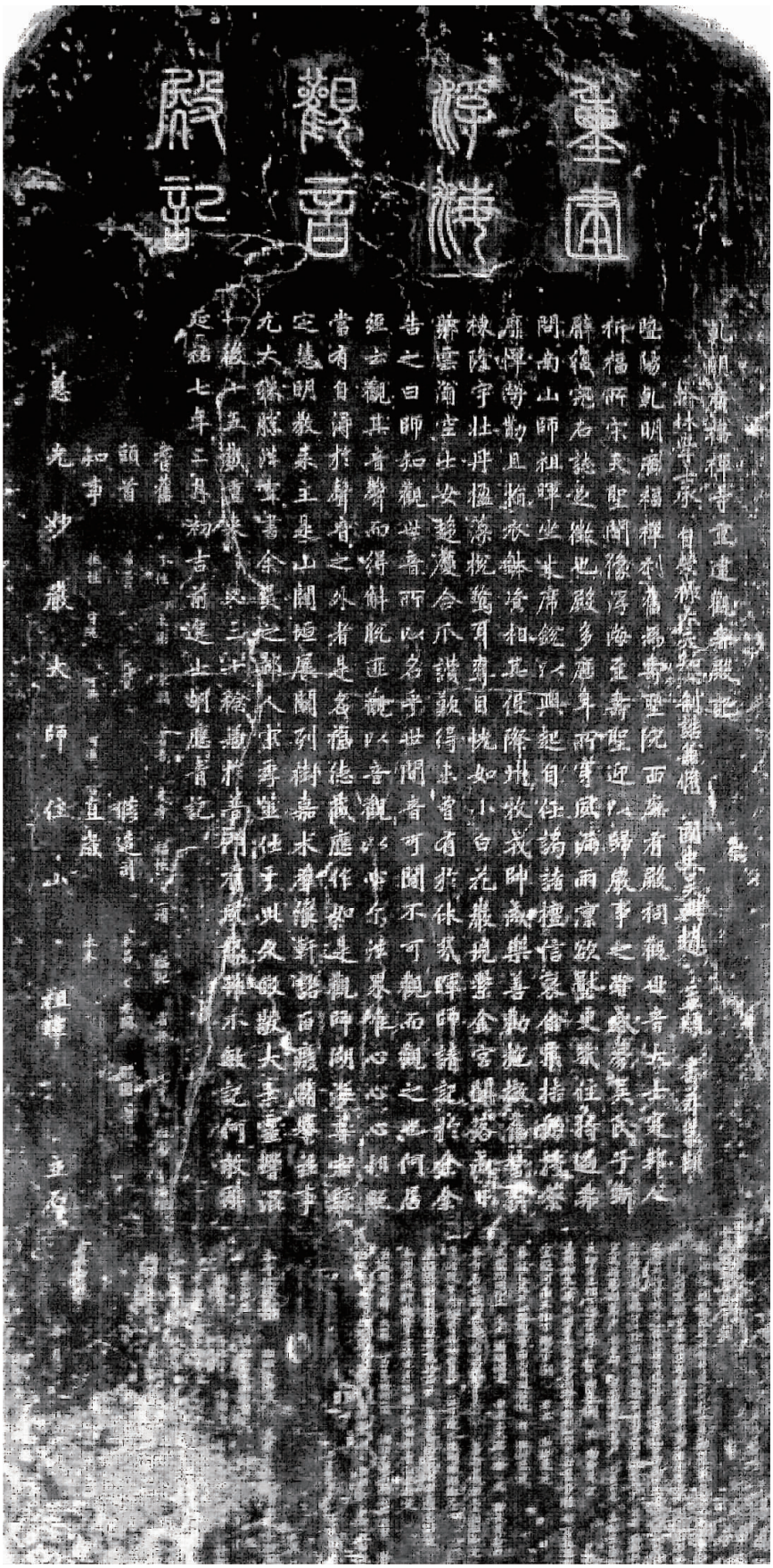
◎李煜章

《江阴县续志》石刻记载：乾明广福禅寺《重建浮海观音殿记》（以下简称碑记），元末建碑，至今，已 700 年。期间历经沧桑磨难，“此碑因赵文敏书，传为至宝，幸未遗失”。（《县续志》）现存江阴中山公园，定期向游人开放观赏。

一、寺毁碑在

乾明广福禅寺，在邑城中、大街广福寺巷，“旧为寿圣院，历唐宋已有之”。寺前天王殿，殿前山门殿，东西钟鼓楼，鼓楼圮钟，“内规制宏敞，为邑中诸刹冠。”《江阴县志》。元延祐七年（1320）“殿多历年所穿风漏雨”，住持发起重修。于是《碑记》随之诞生。年代变迁，禅寺屡建屡毁。就近代而言，清咸丰十年（1860），大殿及东西僧房俱毁。同治十年（1871），募捐建观音殿三间，建文昌殿五间。民国初，县续志载，《碑记》“今在观音寺”。2019 年 5 月 17 日，笔者访中山公园，见俩位同志。一位是，前公园管理负责人吴朴诚先生，当年九十岁。吴先生回忆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碑记》在观音寺；那时，《碑记》被人涂石灰全覆盖，不见碑文。后来，吴先生与人一起清洗，碑文重见天日。情况上报有关部门，省文保派人实地考察，认为该碑已无保存价值。但吴先生不这么认为，元代古碑，应该保存。于是，将心经碑、《碑记》一同移至一旁的铁佛寺。现改为心经碑殿。《碑记》至所以绝处逢生，与吴先生出手保护有直接关系，值得称赞！现列入江阴文保单位。另一位是，江阴旅游公司公园管理处助理兼中山公园管理负责人张剑锋同志。2016 年，他申报，以原铁佛寺为基础重建心经碑殿，获批，于明年春竣工。殿正中墙嵌心经碑，左侧墙嵌《碑记》；并请专业人员对碑刻文字进行技术处理，使碑文清晰一新，基本恢复原状。

乾明广福禅寺，现不复存在，遗迹仅存寺僧曾使用过的一口四眼井，得到当地政府保护。据载，宋嘉祐六年（1061），该井为寺僧宗寿所开凿，其泉清冷，不竭不溢。一井四眼，俗称四眼井，其中三眼青石井圈，为宋时原物。井圈刻楷


重建觀音殿記

书“义勇关泉”四字。明末，江阴人民抗清守城81天，城破之时，义民纷纷投于此井殉难，故又名义井。

二、读文标点

下图，《碑记》全貌；青石底板，元代原物。县续志载：拓本高六尺，宽三尺六寸，20行字，每行26字，正书，字径一寸三分许。额高一尺二寸，宽二尺五寸；篆书四行，每行二字，字径四寸许。下列人名24行，行字不等，字径五分。

《江阴县续志》载读文：

乾明广福禅寺重建观音殿记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吴兴赵孟頫书并篆题

暨阳乾明广福禅刹，旧为寿圣院，西庑有殿祠观世音大士，实邦人祈福所。宋天圣间，像浮海至，寿圣迎以归，严事之。尝感梦，吴氏子断臂复完，石志足征也。殿多历年所穿风漏雨，凛欲压更几，住持过弗问。南山师祖晖坐丈席，锐以兴起自任，谒诸檀信裒金粟，拮据捋茶，靡惮劳勤，且捐衣钵，资相其役。际州牧戎帅咸乐善劝施，撤旧营新，栋隆宇壮，丹楹藻棁，惊耳夺目，恍如小白花严现紫金宫阙。落成日，芟云溶空，士女趋庆，合爪赞叹，得未曾有於休哉。晖师请记於余，余告之曰：“师知观世音所以名乎？世间音可闻不可观，而观之也何居？经云：观其音声而得解脱。匪观以音，观以心尔。法界唯心，心心相照，当有自得于声音之外者。是名福德藏，应作如是观。”师湖海尊宿，繇定慧明教来主是山。辟垣展关，列树嘉木，群像轩豁，百废修举。兹事尤大殊胜，法宜书。余吴之鄙人，宋季筮仕于此，久皈敬大士灵响。混一后十五载重来□又三十稔，若于普门有夙缘，虽不敏，记何敢辞？延祐七年二月初吉，前进士胡应青记。……光妙严大师住山祖晖立石。

今具施主名衔于后：

都劝缘朝散大夫江阴州达鲁花赤兼劝农事速安答失助钞壹拾定。昭勇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达鲁花赤脱脱助钞伍定。定远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万天□□撒儿助米贰拾石。怀远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副万户完者助钞伍定。宣武将军副万户完者都宣武将军副万户完者不花各助米壹拾石。太师右丞相下总管蔡资同妻刘氏助钞二定。吴兴郡夫人汤氏同男奉议大夫台州路黄岩州知州兼劝农事陆镗一力朱漆殿柱。宣授河南王位下总管刘若水助钞贰定。奉议大夫平江路总管府治中致仕侯邦助钞贰定。武龙州同知丘定夫助钞伍定。申浦王大孺人余氏助米贰拾石。本寺居士张觉真暨同修常氏妙净喜捨中统钞壹伯伍拾定。夏浦陈子厚提督助柏柱贰口。江下庞三提领助柏柱壹口。茶埼张谦甫提领助米贰拾石。夏浦蔡福五提领助芦壹拾定。本州在城檀越暨十方施主并市铺户其助钞壹伯伍拾定。在城缪宅薛氏四娘一力喜助竹篾，湖泊大使石桥赵德贤助缘。陶城李元善史墅余世□冯塘龚应龙湖塘徐希颜各助钞贰定。

本寺住持南山助钞壹拾定。大耆旧彬都寺助米叁拾石。昙首座、性都寺各助钞贰定。润都管、吾都管、净都寺、清都寺、都寺、悟都寺、亨都寺各助壹定。纯都寺、洪监寺、通副寺共助□□□

禅寺长老祥符寺缺……

宋天圣元年（1023），一吴姓者，梦见观音浮海而至，自是讹传。县志称此为“观音妖像”，于弘治七年（1494），以设会聚众贻患地方毁而焚之。（弘治《江阴县志》）。

三、《碑记》价值

《碑记》，元胡应青撰、赵孟頫书。胡应青，吴城人，南宋进士，元时再出，咸淳九年（1273）任江阴尉。赵孟頫（1254 — 1322），字子昂，湖州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延祐时，官居翰林院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他是元代书画家、文学家。卒谥文敏。碑题：重建浮海观音殿记，篆体书，碑文，正楷体书；圆转遒丽。

碑文，分两部份，上半部份，记述佛事及修寺经过，下半部份，“碑下文”。碑下文，实是捐款捐物功德碑。其曰：”昭勇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达鲁花赤脱脱助钞伍定”。这一段，为后人提供一个历史事实；即元江阴驻军：番号，通事汉军；军事机构，上万户府；最高将领二员。一员是，驻军最高监治长官达鲁花赤脱脱；另一员是，最高军事长官万户李八撒儿（谱名李伯察。蒙古语音李八撒儿。）

民国初，县续志总纂缪荃孙先生评《碑记》的历史作用。缪荃孙（1844 – 1919），字炎之，江阴人。光绪二年进士，清史馆总纂。他说：《碑记》所载名衔，”职官与兵志均不载”。这给后人提示，此碑非同一般，是元史的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晓在《宋元时代的通事与通事军》一文说：“至元二十二年，元朝政府对驻守江淮、江西地区的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统一进行整编，总共编为三十七翼万户，但其中并无任何通事军有关番号。（注：《元史》卷 13《世祖纪 10》、卷 99《兵志、镇戍》都无）。但据该碑，碑文题名有昭勇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达鲁花赤脱脱，定远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万户□□撒儿……。”

本次，考《碑记》。发现元江阴李氏二位（李八撒儿、脱脱）先祖事迹呈现《碑记》。若无此碑，江阴李氏这段历史被湮没在尘海里，无人知晓。由此可知，《碑记》亦是李氏先祖纪绩碑。元亡后，李氏后代遍及江阴、青阳、南闸、三观、周庄、华士、北漍、苏州等地区，为江阴望族。

《碑记》既填补《元史》空白，又有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书法真迹，十分难得。

四、余论

碑下文，记载捐款捐物人 26 名，捐款单位 13 个；其中驻军将领 5 名，包括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万户多人。

两员最高将领，一员曰：“定远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万天□□撒儿助米贰拾石”。因年久，碑刻局部略有风化。其文字 “万天”，应为万户之误，两个方块，缺失两字，为“李八”。完整表述，定远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万户李八撒儿助米贰拾石。通事，官吏名，古代指翻译人员。到宋、蒙元时期，通事演变为一种特殊群体，即因避罪、被掳掠等原因而寓居他国的异族人，其中大多数是战争中俘获的人口，南宋灭亡后，将其收编组建元通事军。

通事汉军上万户府万户李八撒儿（1264—?），应从其父李占哥说起。据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载：“李占哥，女直人，寿州等处招讨使，行江阴镇江安抚使司达鲁花赤，至元十二年三月至。”俞希鲁，字用中，浙江温州人，时任江山县尹。此志纂修，当在至顺初。它是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之一，可补正史之不足。一年后，安抚使司撤销，李占哥回归原军事编制。至元十六年十月，李占哥奏本朝廷，请求召募通事军人，得到忽必烈批准。朝廷命伯安歹、李占哥负责此工作（《元典章》）。至元末，以召募来的通事军人为基础，组建通事汉军上万户府，驻地迁往建康（南京）东面的江阴许浦等处。李占哥是主要筹建者之一，当之无愧第一任通事汉军上万户府万户，并为子孙世袭。李占哥与其长子李八撒儿职务交接时间，在《元典章·李万户宰马》一文中的“江阴州李万户、万户八撒儿、钦受宣命三品军官”，即《碑记》中李八撒儿。据赤岸《李氏宗谱·五述编》载，“今广福禅寺有铜钟相传为李八撒儿舍铜一千觔所铸。钟铸字云，大元至正九年屠维赤奋若八月初二日庚寅吉辰铸造。”到至正九年（1349），李八撒儿还健在，卒年不详，墓在青阳镇树家村，旁建有祠堂，解放前，设守墓人看管。

一员曰：昭勇大将軍脱脱。脱脱，李八撒儿长子（元末《李氏宗谱》），江阴驻军达鲁花赤、正三品、江浙参政；与其父，同镇江阴、平江等处。证据有三：1、《碑记》有名份。2、《全元文》（郑元佑撰《白云漫士陶君墓碣》有记载。郑元佑（1292–1364），字明德，处州遂昌（今浙江遂昌）人，后偕兄移居姑苏。其载：“至正壬辰（1352）……再除湖州归安县，时方兵兴，长兴州已陷，浙省参政脱脱檄君与乌程县各运粮二万斛给馈饷。”这是脱脱履职参政任上一个缩影。3、元人揭汯撰《户部尚书贡公神道碑铭》。至正十六年（1356），贡师泰“又调平江路总管。时淮南张士诚之众已压境，或谓‘宜迟迟其行’。公曰上命也。时任江浙参政脱脱，分省是郡，守御调度。”（摘自《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篇 420 页）

（作者：无锡市文史爱好者）

北京西山访叶飞

——纪念江抗东进80周年

◎徐泉法



一、前去西山

1987年春夏间，江阴县委党史办公室决定编写党史大专题《江阴沧桑录》，其中有两篇重头文章，一是《铁流东进》，由王国中承担写作，二是《东路之魂》，由笔者承担写作。为了完成任务，王国中和笔者决定前去北京，重点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和已故副委员长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这年9月20日晚上9时30分，我们两人到了北京，连夜盘算怎样见到叶飞和葛慧敏，采访到这两个专题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天，我们就找到了副委员长叶飞的住宿地——北京交道口后园恩寺。警卫班长许元真看过我们的介绍信，诚恳地说：“首长正在医院检查身体，能不能接受采访，需要到明天即9月22日晚上再予联系。”9月22日上午，我们决定先访谭震林夫人葛慧敏，赶到她的住地南沙沟，在居委会的帮助下，见到了谭震林的儿子，他告诉我们妈妈正在医院治病。这天傍晚，许元真在电话里说，首长很重视江阴同志来北京采访，具体日期要到国庆节后才能确定。直到这时，我们才真切感到，到北京采访高级干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能耐心地等待与联系。

国庆节前，我们终于见到了葛慧敏。医生嘱其不能接受采访，葛慧敏知道我们去一趟北京有多难，答应一天隔天下午回忆谭震林在苏南东路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过。在间隙其间，我们访问了叶藻、钱敏、肖英、梅益、吕炳奎等新四军老干部，吕炳奎告诉我们，叶飞左脸靠近耳朵的地方有一个伤疤，建议我们访问叶飞时，问一问这伤疤是何时何地受的伤。国庆节刚过，我们就主动与警卫班长许元真联系，他要我们再耐心等待。10月9日晚上，许班长打来电话，约定我们在10月10日下午3时30分到达叶飞住地北京西山，他会在当天下午2时50分开车来到我们住地三里河招待所。他反复关照，去西山的车必须由我们自己解决。

我们接到电话，兴奋之余，又犯起了愁。去西山的汽车我们又到哪里去解决呢？由于经济限制，凡是去外地采访老干部，按党史办的规定是不允许乘坐出租汽车的。我们决定求助在北京采访过的老干部，向他们借一辆汽车用半天。第一个想到的是梅益，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译者，采访他时在党史研究和写作上给了我们许多指导。更重要的是，他的夫人尹绮华是江阴人，看在家乡人的面上或许会帮助我们。接通电话后，尹绮华果然很热情，答应将梅益的专车借给我们。她立即与丈夫联系，梅益告诉她，10 月 10 日他的汽车要到下午 4 时才到家，这显然来不及了。我们又联系叶藻，他是 1938 年 4 月从上海到江阴投身抗战，建国后担任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是一位离休的高级干部，有支配汽车的权力。不巧的是，这天下午他的汽车要去接送一位客人，不能借出来。车子没有借到，我们只得乘坐出租车前去西山，显然违反了单位的规定，总要比失去面访叶飞副委员长机会造成的损失小得多。于是我们打通了北京香格里拉宾馆，提出 10 月 10 日下午租车，宾馆方面爽快地答应了。

10 月 10 下午 2 时 50 分，叶飞警卫班长许元真的车准时到达，车里还坐着叶飞秘书小孙，老秘书王昊。王昊是江阴人，常年在叶飞身边工作。这次我们能够如愿面访叶飞，他在其中或许起了不小作用。就在此时，香格里拉宾馆出租汽车也按约赶到我们住地。我们上了出租车，两辆汽车就向北京西山开去。

二、西山采访

下午 3 时 30 分，我们到达目的地。这里戒备森严，前后有三道岗哨检查我们随身携带的物件。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许班长汽车领路，或者我们不乘坐出租汽车步行前去，那是绝对进不了叶飞副委员长的住地！我们走进一幢房子，叶飞笑容满面地站起来迎接我们。我注意打量他的形象，他虽然已年过七旬，头发花白而稀疏，但面色红润，眼眸闪光，精神矍铄，说话声音洪亮。他的左耳附近的脸上，果然如吕炳奎所说，有一个不很明显的圆形伤疤。须臾间，叶飞在会客室两排沙发的交角处坐下，王昊安排我坐在叶飞的右边，王国中坐在叶飞的左边，这样便于我们采访。叶飞对面则是新老秘书小孙和王昊。

叶飞见我们已经坐定，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江阴准备出一本书?”

我回答说：“是的，市委党史办公室要出一本党史大专题，书名叫《江阴沧桑录》。”

“那你们提问题吧。”叶飞一句话把采访引向了正题。

承担写作《铁流东进》的王国中接着说：“请首长对江抗东进的专题作指导。”

叶飞沉思片刻，神情严肃地说：“你们要写江抗东进，第一个问题一定要反映出来，就是江抗东进的意义、作用和项英陈毅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否则就不能触及东进的核心。”

叶飞告诉我们，1938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

在《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中，明确指出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敌人占领地区，必须迅速组建民众武装，发动民众抗日斗争，建立敌后根据地。这就是著名的第一个五四指示。陈毅筹划江抗东进，就是执行中央的第一个五四指示，要冲破国民党对新四军采取的限制政策，打开苏南东路的抗战局面。但是，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即政委的项英，对中央的五四指示持怀疑态度，不赞成甚至反对陈毅决策的江抗东进。项英认为这样做超出了国民党对新四军规定的活动范围，势必会破坏统一战线。这样，项陈之间的分歧就无法避免了。陈毅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冲突，没有用新四军的番号，而用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安排新四军六团团长叶飞向国民党三战区请了病假，并改名为叶琛，六团副团长吴焜、参谋长乔信民、政治处主任刘松青都分别改了名。1939 年 5 月初，陈毅任命梅光迪为江抗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为副总指挥，组成江抗东进的领导班子。因为梅光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脱离了党组织，现在只是一名统战对象，因此实际指挥权掌握在叶飞手里。一切准备就绪，就在江抗出发之际，项英给陈毅发来一份电报，江抗东进险些扼杀在摇篮里。

叶飞说到这里，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件事虽然过去了 48 年（1939 ~ 1987），因为涉及到江抗命运，他依然有些激动。“陈司令，江抗明天（5 月 5 日）就要出发，你找我还有什么吩咐吗？”稍停片刻，叶飞又坐回到沙发上，向我们回忆当年 5 月 4 日发生在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里的事：陈毅随即向叶飞递过去项英发来的电报，上面是不同意江抗东进的两大理由，第一，东进冲出了国民党给新四军一支队限制的活动范围，这会破坏统一战线；第二，苏南东路是侵华日军的心脏地区，部队有被消灭的危险。陈毅向叶飞问道：“这份电报不同意江抗东进，你看怎么办？”叶飞知道这是项英与陈毅在东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作为他俩的下级他不便表态，于是沉默着不说话。陈毅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来回踱着步子，十分钟后，突然向叶飞问道：“你们部队进入东路，会不会被日军消灭？”

“不仅不会被消灭，还可以得到发展。”叶飞回答得十分肯定。

陈毅接着又问：“你有把握？”

“不只是我有把握，全团指战员都有把握！”叶飞加深语气，回答得更加干脆、坚决和有力。

“好！你们明天就出发。”陈毅最终作出了决心，下达了江抗东进的命令。

“破坏统一战线怎么办？”叶飞不放心地追问道。

“这不关你的事，这事由我负责！”陈毅为了让叶飞放心东进，主动承担了可能出现的责任。

这是 1939 年 5 月 4 日江抗东进前夕，发生在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里两位领导人之间短促而又极为重要的对话。我们从中看到，为了东进抗日，发展力量，陈毅和叶飞承受了多大的

政治压力，以及从字里行间隐藏着的英雄气概与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为了防止节外生枝，叶飞把江抗出发时间提早了两个小时，5 月 5 日凌晨 2 时，一支 700 余人的队伍从溧阳驻地出发，当天到达武进戴溪桥，与何克希领导的江抗三路 300 余人汇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5 月 8 日江抗到达无锡梅村，中共江南特委领导的无锡各界抗日联合会，组织召开了 3000 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

我和王国中趁着叶飞喝茶休息片刻的机会，要求首长介绍江抗东进与日军发生的几次重大战斗。叶飞接着说，江抗东进途中，多次袭击日军据点，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打出了江抗的军威。主要的战斗有三次，第一次是 1939 年 5 月 30 日无锡黄土塘战斗，击毙日军 30 余名。第二次是 6 月 24 日苏州浒墅关战斗，歼灭日军警备队 20 余人，烧毁浒墅关火车站，破坏铁路一段，迫使京沪铁路交通中断三天，上海和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第三次是 7 月中下旬，江抗在追击伪军时，袭击了日军虹桥飞机场。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党史界对江抗袭击虹桥机场，有没有火烧飞机有过争议，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查阅了当年采访叶飞的记录本，上面是这样记载的：“江抗追到机场，一打进去，鬼子也慌了，守在碉堡里，用探照灯观察动静。大家一看，知道到了日军飞机场。飞机又抬不回来，就用手榴弹去炸，引起大火，烧毁了四架飞机。”把这段记录全文抄录，一是尊重当年采访时的实际情况，二是供考证这次战斗的党史专家们参考。研究江抗东进的人都知道，江抗从溧阳驻地出发，直到上海郊区，在 5 个多月时间里，与日军正面交锋远不止上述三次战斗，有些战斗，如 1939 年 8 月 12 日青浦草鞋浜战斗，江抗三路五支队支队长刘金林、教导员华企哲等 33 名指战员壮烈牺牲；9 月上旬江阴长泾油车里战斗，21 名江抗战士倒在日军枪口之下。江抗在与日军作战时取得的辉煌战果包括付出的代价，都说明江抗东进抗日的目的不容置疑，用铁的事实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强加于江抗的污蔑不实之词，江抗东进的英雄史诗，80 年来，早已融进东路人民的记忆和载入抗日战争史册而光耀千秋！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是怎样对待江抗东进的呢？叶飞谈到这个话题，气愤地指出，国民党出于反共的本质和一党之私利，完全不顾大敌当前国土沦丧的严峻局势，声嘶力竭地攻击江抗，限制江抗，当看到江抗在东进期间英勇杀敌、军纪严明而得到人民衷心拥护、队伍不断壮大时，更是迫不及待地调集军队，围追堵截，阴谋将江抗消灭在东进的征途上。1939 年 8 月，江抗已从东进初的 1000 余人发展到 5000 余人，整编为二、三、四、五路部队，浩浩荡荡从常熟西进江阴境内。9 月 3 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五支队纠集其他顽军，抢占顾山山头，企图阻断江抗回师之路。面对忠救军挑衅，叶飞指挥江抗英勇反击，一举击退顽军的进攻。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飞（即刘松青）在率部反击途中，不幸在顾山山上中弹负伤。顾山之战后，国民党迅速从宜兴山里调集忠救军一、二支队，加上原来盘踞在澄锡虞地区的忠

救军五支队、十支队和其他反共武装，已有上万兵力，以逸待劳，频频向江抗发起挑战。叶飞急电陈毅请求派部增援。随即王必成率领新四军二团赶到锡澄边境。9月8日，江抗在无锡鸿山、鞋山一线，与忠救军展开激战。江抗在主动撤离战场时，副总指挥吴焜在江阴马镇湖塘里遭遇忠救军袭击，不幸中弹牺牲。五千江抗将士集结江阴周庄定山湾，同仇敌忾决定为吴焜报仇。叶飞向陈毅连发数电请战，一场决定东路抗战前途的反磨擦大战一触即发。

在这紧要关头，陈毅连发三份电报，命令江抗西撤，并告诉我们，他将亲到江阴，处理撤退事宜。叶飞说到这件事，心里依然感到困惑：如果陈毅不赞成反击忠救军，那么他不会派新四军二团前来增援。如果赞成反击，那又为什么要命令江抗西撤？这其中深层原因，叶飞分析说，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新四军军部所受国民党三战区压力太大了；二是陈毅决定把江抗调往苏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当江抗奉命撤至江阴西石桥时，陈毅就来了。当时叶飞心里的结还没有解开，当面询问陈毅：为什么西撤的命令下得这样急？陈毅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你们另有任务”。后来叶飞也理解了，如果陈毅把江抗西撤的原委说出来，那么就要把他与项英之间的矛盾公布于众。组织观念很强的陈毅，自然不会这样做的。

叶飞在这次接受我们采访时，明确说到他与陈毅是在西石桥会面的。但是许多党史著作中，都记载陈毅当年10月初到过江阴周庄定山湾江抗驻地。由于面访时间短暂，笔者和王国中都没有当面请教这个问题。作为采访记，笔者必须根据被访者口述如实记录，至于陈毅有无到过定山湾，只能交给党史工作者去考证了。

江抗在西石桥整编为江抗一团、江抗二团，因为事发江阴境内，我们希望叶飞讲得具体些。但是，叶飞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却对江抗在东路另外两件大事关照我们说：一件大事是夏光等数十个伤病员在阳澄湖养伤和坚持斗争，。他肯定地说，京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就是夏光。夏光以江抗伤病员作基础，组建江抗东路司令部，这段历史要写好，突出新江抗的地位和作用。另一件大事是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到东路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这需要单独写一篇。笔者回答说：“这篇题目已经起好了，叫《东路之魂》，由我负责完成。”叶飞表示赞成。接着，他又特别叮嘱说：写作江抗东进历史，不能忘了地方党组织所起的重要作用，像任天石、杨浩庐、吕炳奎、顾复生、于玲，这些地方党员干部，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江抗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东路抗战史册上，应有他们的一席地位。

下午5时30分，王昊提醒我们，首长讲了两个小时，已经超出了原定的计划，示意可以结束了。我想起叶飞左脸上的伤疤，就向王昊提出这个问题。王昊说，首长写作的《叶飞回忆录》，明年可望出版，上面记载了受伤的具体经过。那是1933年冬，首长在闽东福安县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一颗子弹打在脸上，留下了一个疤，另一颗子弹打在胸部，直至今天，弹头还留在里边。我们两人都唏嘘

不已，更增加对叶飞副委员长的敬重。应我们请求，叶飞答应和我们合影留念。王昊把我们送至门口，低声说道：“首长一直怀念着牺牲在江阴的战友，惦记着当年支援、拥护江抗的江阴人民，他有计划要去江阴看望父老乡亲。”这次西山采访，我们满载而归。我们依然乘坐那辆香格里拉宾馆出租车回到三里河招待所，一共支付了 68 元出租车费，回到江阴后，党史办领导特批报销了这笔费用。

三、情系江阴

叶飞副委员长这次破格接受我们采访，让我们深受感动。在他心里，不仅记忆着当年在东路包括江阴土地上的抗日烽火，更记忆着吴焜、刘飞等战友们流淌过的殷殷鲜血，记忆着这里的人民群众与江抗的鱼水深情。早在 1984 年 10 月，叶飞应中共江阴县委的请求，亲笔题写了“吴焜烈士埋葬处纪念碑”，第二年清明节，“纪念碑”高高地耸立在周庄定山西麓。1987 年 5 月，叶飞又应江阴县委之请，亲书陈毅《夜过江阴履国防废垒有作》：“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客过风兴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接着挥毫写道：“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四军老六团奉命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番号东进抗日，直抵沪郊，威震江南。十月，陈毅司令员到江阴布置北渡长江，发展苏北，目睹国民党军丢弃的江阴要塞，似一盘散沙，形同废垒，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夜过江阴履国防废垒有作’一诗。近闻江阴人民兴建陈毅诗碑亭，特录诗作以志。叶飞 一九八七年五月录”。不久，“陈毅诗碑亭”就在江阴黄山中部竣工，叶飞上述书法作品分别镌刻在该亭正面与背面，成为黄山新添的一道著名风景点。

1989 年 4 月，《江阴沧桑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叶飞收到江阴市委党史办寄去的赠书，对王国中所写《铁流东进》、徐泉法所写《东路之魂》感到满意，重回当年烽火战场看看的愿望更加强烈。1990 年 5 月 4 日，叶飞和他夫人王于耕终于踏上了江阴这块热土。太阳刚刚从地平线露脸，他就催着随行人员早早启程，驱车前往耸立于长江之畔的黄山山顶。这里曾是著名的江阴要塞，41 年前（1949 ~ 1990），他曾在长江对岸亲自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0 兵团 23 军、28 军、29 军、31 军强渡长江和策反江阴要塞国民党官兵起义，红旗插遍了包括江阴在内的江南大地。叶飞走近他亲笔书写的“陈毅诗碑亭”，陈毅当年诗人气概和江抗东进的英雄创举依然历历在目。当天上午，叶飞决定前去定山西麓看望“吴焜烈士埋葬处纪念碑”，从江阴市委那里得悉定山附近正在施工修路而未能成行。上午，叶飞驱车去了华西村，下午去了祝塘镇。51 年前（1939 ~ 1990），叶飞在祝塘指挥江抗挫败忠救军第五支队挑衅，现在，镇上一家家服装厂拔地而起，数以千计的年轻农民成了穿针走线的制衣工人。当叶飞知道祝塘镇在外贸上取得了骄人成绩时，兴奋地手书“江南外贸第一镇”七个大字，这成为祝塘人民永久的骄傲。

叶飞晚年，依然牵挂着江阴政治经济文化

的发展，尤其关心党史工作取得的每一个成绩。1990 年 5 月，叶飞为“顾山烈士陵园”手书园名。1991 年春，为《江阴人民革命史》题签。1996 年秋，又为《魂归黄山陵》题写书名，并担任该书顾问。不久，又为即将开馆的江阴“革命烈士纪念馆”题写馆名。让人感动的是，叶飞为江阴党史工作多次题词，都不收任何报酬。1999 年 4 月 18 日，叶飞在北京不幸逝世。消息传到江阴，人们无不深情缅怀叶飞在江阴土地上留下的丰功伟绩。刻印在人们心坎上的历史丰碑，是千秋万代不会消逝的。

谨以此文，纪念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 80 周年，叶飞逝世 20 周年。

（作者：江阴市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江阴文博》征稿启事

《江阴文博》是江阴的文博工作者和历史研究人员的学术园地和信息交流平台，是侧重于研究江阴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学及江阴地方史的专业性内部刊物，由江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江阴市博物馆主办，创刊于 1999 年，至今已出版了三十多期。刊物立足江阴，面向全国，在保持刊物学术性的基础上注重可读性、时效性、艺术性，旨在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江阴文博事业发展，普及文物知识，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开展学术研究，展示研究成果，提供研究信息。现《江阴文博》面向全社会征稿。

来稿要求：

1、来稿必须是原创，不得抄袭或转摘，要求主题突出，条理清晰，文字简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史料价值。

2、稿件字数为 2000–5000 字为宜，文字与标点符号符合规范，引文务必准确，注明出处，来稿请使用电子邮件，不接受纸质文稿。

3、对采用稿在不失于原文文意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做适当删改和文字加工，如本人不同意删改，请加说明。

4、来稿不能刊用者一律不退还电子稿，请自留电子稿。

5、投稿者请注明姓名、职务、职称、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及邮编等信息，以便于联系沟通。

6、来稿请发到《江阴文博》邮箱：jymuseum@sina.com。

刘半农与南社琐记

◎ 李建华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文人结社仿佛是一个久远的传说一般，只在史籍钩沉与章回小说中留下一些依稀的碎影，比如东林党，比如几社、复社等，而离当下最近的，则是南社。

今年是南社的 110 周年诞辰，110 年前的 1909 年 11 月 13 日，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发起成立的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社会职业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社团组织，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其成员被认为囊括当时“中国半数的知识精英”，不仅包括毛泽东的诗友柳亚子，更有辛亥革命的干将、国民党元老、共产党精英，也有文坛领袖、书画巨匠，如于右任、鲁迅、李叔同、苏曼殊、黄宾虹、林庚白、马君武等。今人纪念南社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一次坚守文化遗产的盛举。

江阴人刘半农与南社早有关联，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他肄业于常州府中学堂，回到江阴后，在当小学教员时，利用业余时间和吴研因等编辑《江阴杂志》，这本进步杂志所提倡的爱国、气节等思想就是南社所倡导的宗旨。刘半农在思想上与南社社员保持着一致性，1912 年春，当他进入上海开明剧社当编辑后，特别是靠文笔站稳了脚跟，就立即提出要求加入南社这个社团。

南社发起者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人都已经认识他，当然是通过一些不同凡响的通俗小说，有一篇揭露辫帅张勋镇压二次革命，荼毒地方百姓的罪行的百字小说《秋声》，在《时事新报·杂俎》上发表后，还荣获该报专栏悬赏的一等奖。给柳亚子等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鼓励他继续用这种壮怀激烈的笔法再写些“文明戏”新剧，后来人家还送刘半农一本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这本杂志，对刘半农写新剧帮助很大。不久，他就写出了一出新剧《都督梦》，这是根据他自己在清江当兵时的见闻写的讽刺剧，演出后好评如潮。

刘半农在上海五年时间里，工作的场所有《演说报》社、开明剧社、《中华民报》社、《时事新报》社、中华书局、《中华新报》社等，

他以半侬等笔名发表翻译及创作小说竟达 40 多部，累计百万余字，成为享誉国内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

刘半农的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时事新报》、《小说月报》、《小说海》和《礼拜六》等杂志上，刘半农微醺之中，喜欢自嘲自己也有点“鸳鸯蝴蝶派”味道，并且他与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包天笑、张恨水、严独鹤、程小青、周瘦鹃等交往甚密。后来，不少人认为刘半农是“鸳鸯蝴蝶派”。然而，对刘半农这一时期的作品稍加考察，就可发现他与鸳鸯蝴蝶派有着明显的区别。众所周知，鸳鸯蝴蝶派是指这派作家惯于用文言文描写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之类的哀情小说。“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是这派作家笔下的永恒主题。但是，刘半农却很少涉及这类题材。

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曾提及“刘半农翻译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写清朝的闭关自守时期，英国人如何委曲求全，想窥探门户，乘隙而入，在礼节上起了不小的争执，结果还是英使勉强服从，保持了中国的尊严。这和鸦片战争以来，满清王室的惧外媚外的狼狈相对照，很有意义”。

刘半农创作的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有明显区别，它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上。他写的小说《稗史罪言》，就深刻揭示了当时“官遇老百姓胜，老百姓畏官也；洋鬼子遇官胜，官畏洋鬼子也；老百姓遇洋鬼子胜，洋鬼子畏老百姓之毁教也”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现实。他的《催租叟》，在揭露阶级对立、描写劳苦大众等方面成就更为显著。小说通过巧妙的安排和强烈的对比，狠狠鞭笞了为富不仁者，热情讴歌了劳苦的工人形象。还有描写一群巴儿狗舐洋大人臭屁股的《奴才》、在上海滩沉浮的《可怜之少年》以及《歇浦陆沉记》等。这些诅咒旧社会昏庸黑暗，同情劳苦大众的作品，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罕有先例，这是合乎南社宗旨的。

刘半农在南社活动期间，除了在文学上收获颇丰外，最重要的是结识了一批对他日后的发展方向影响深刻的人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有陈独秀和苏曼殊，还有就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等。

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人很器重刘半农，他们认为刘半农的文章不仅仅是为了取笑逗乐，而是都是有所指向，他不是粉饰太平，其主旨隐然和“南社”的革命活动相一致。

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规模革命文化团体，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弘扬爱国热情，光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时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盛誉。

当时江苏是南社的大本营，三位发起人陈去病，柳亚子是吴江人，高旭是金山人，金山当时属于江苏，所以说都是江苏人。南社在苏州成立，雅集主要在上海，当时也属于江苏。因此南社人中，江苏人最多，达 439 人。

柳亚子先生在《南社纪略》中所载的江阴人还有几位，如承家麟，入社时间较早，1911 年初就加入了，入社书号 118，稍晚于戴季陶，而早于陈其美。据陈去病《南社杂佩》记载，承家麟当时在沪宁铁路局会计课任职——这一

职务在中国会计史上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第一种会计期刊就是 1915 年沪宁铁路局主办的铁路会计统计年报，从他的任职时期来看，承家麟很可能参加了中国第一种会计期刊的创办。承家麟后来还参加了新南社。1923 年成立的新南社是南社的更新改组，他和国民党的一大改组呼应，实际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新南社就包括了茅盾等共产党员。

新南社中还有一位江阴人，叫周刚直，又名周水平，他加入南社的时间为 1923 年，当时他在川沙师范讲习所任教员，那时为更新改组后的新南社。后来他成为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领导了江阴的农民运动，后来在革命中献出了生命，成为国共两党都颂扬的英烈人物。另一位江阴藉南社人叫庄庆祥，他出自南菁书院，庄庆祥加入南社时在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工作。商务印书馆当时一大批人，如《小说月报》主编王蕴章等，都是南社社员。庄庆祥是为商务印书馆立了大功的。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经济效益主要依赖两大系列，一是《说部丛书》，另一是教科书，而教科书的主编之一就是庄庆祥，他主编的《共和国教科书》奠定了现代教科书的基础。庄庆祥后来长期任职于上海民立中学。南社不仅有文学家，还有众多出版人才，属于出版家的有江阴籍人才李小峰，他与其兄创办的北新书局在现代文学出版史上有重要地位。北新——即北京大学新潮社的简称。他们代表的刚直不阿，追求进步的精神，是江阴人人心齐、民心刚、敢攀登、创一流品格的体现。

南社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影响，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

南社文化涉及到文学、教育、新闻、历史、戏曲、音乐、宗教、书画、法律、科技和军事等领域，涵盖面很广。南社不单纯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它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出现，这本身就触发人们思考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出现的背后动因。但过去学术界对它的评价和定位不够，认为它不属于新文化，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化视野以外，将其划分到古典文化范畴，对这一段尘封近一百年历史的挖掘认识不够，特别是没有看到它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所独具的承前启后的意义，这与南社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它现在所处的历史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仅刘半农、周水平，就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不朽，看到了真正的生命并不因为身体的逝去而消失，他们一直活在人们心目中。

还应该提到的是，南社以它遍布国内各个行业的 1000 余名社员（实际达 1180 余人，加上分社成员，总数达两三千人）。和相关的刊物，构成了类似梁启超所说的“学者社会”中的一个巨型的学者社区。松散的、轻松自由的联谊关系构成的独立的学者社会，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在现代学院体制下消逝的传统之一。

中国近代西式教育体系建立之后，部分传统文化内容，诸如诗词、书画、篆刻等，很大程度上被学院教育拒斥。而南社及其成员，以

及他们所依存所联系的文化圈，通过家传、师承、社团等学院外的民间形式，继续传承这些民族文化之脉。此外南社人在图书馆、地方志等方面也做出诸多贡献，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文史馆工作过，是现代方志和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

南社先贤和他们后裔的历史，是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承前启后，为中国独立、民主、富强，为中华雄起，在黑暗中呐喊，在烽火中奋战，经历过屈辱，终于迎来崛起与和谐的历程，是一部 20 世纪中国人的叙事诗，他们也可以说是我们这百年史迹，值得作为民族的记忆流传不绝。

（作者：江阴市澄星集团宣传部干事）



“五四”运动影响下的江阴革命活动

——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而作　◎薛仲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不但无理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反而明文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纷纷举行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 等口号，并举行游行示威。时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员和《新青年》杂志编辑的刘半农当天就参与学生运动并独自坐守北大指挥部领导与指挥学生运动。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市的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学生3000多人前往天安门前游行集会，大家高呼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合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在举行游行示威时，军政府派军警赴现场进行镇压，第二天，北京市大专院校学生又进行大规模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并致电祝贺。

1919年6月3日，北京军政府又大批逮捕北京师生，这更激起全国各地各界人民的愤怒。北京大学法科的校舍又被反动军警围占，妄图进行血腥镇压。此时，刘半农挺身而出，他作为北大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和钱玄同、沈尹然等20多名教授联合抗议，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本校全体教职员诸君函》文章，援助被军警当局监禁的学生和教员。同时，刘半农还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鲁迅先生称赞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和先锋。

此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江阴青阳人李小峰，受李大钊、鲁迅的直接影响，担任“新潮社”干事，他们全力参加“五四”运动并坚守“新潮社”的阵地，成为后期《新潮》杂志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夏港人吴文藻，在北京女师大读书的江阴城内高巷人张曼云等都踊跃投身到了“五四”运动行列中去，并踊跃参加在天安门前举行的集会游行活动中去。

一

“五四”爱国运动由此影响全国，也波及和推动了江阴师生的爱国运动。江苏省南菁中学学生们率先行动，并联合城区的励实中学、辅实女中与夏港静堂里的江苏省乙种农校以及城内的礼延、

辅延、澄南等高等小学，组织江阴学生联合会并发动与组织师生们上街游行示威，学生在游行时手执标语，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还广泛散发传单，广大市民们拍手称快。接着杨舍、后塍与青阳等中小学校师生也纷纷上街宣传与游行。

6月3日，江阴所有学校举行声援性的联合罢课，部分商人和手工业工人也加入进行列。为唤醒民众抵制日货，南菁中学、励实中学的两校学生并肩开展“查禁日货”的宣传活动，有一天夜里，在南门外轮船码头查货到奸商私运的三船日纱，师生们就与奸商及其帮凶展开了搏斗，励实学堂师生李士俊、叶培忠等多人受伤。师生代表当即向法庭申诉，后来奸商被罚金千元以上，大家就将该款作为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基金。

乙种农校设在虹桥附近的积谷仓内的校区，主要招收江阴东南乡区的贫苦农民子弟，同学们怀着誓雪国耻的决心，刻苦学习，锻炼身体，强壮体魄，师生们还谱写了报国卫乡的新校歌：“扬子江潮声到门，声声唤起江阴魂……”，形象地刻划了如大江春潮般气势的“五四”运动，唤起了江阴人民的觉醒。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初，江阴各界群众团体成立“五卅后援会”，开展罢课、罢工、罢市活动，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14日，全县各学校又集中罢课，全力声援北京的“六三”学生运动。同时还选派代表前往上海进行慰问与捐款。6月30日在江阴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公祭大会，悼念在五卅惨案中遇难烈士。所有街道悬白旗示哀。公祭大会会场悬挂“歌斯哭斯，匹夫有责；剑及履及，与子同仇”的挽联。中共党员，时任上海大学学生会长张庆孚专程来江阴参加公祭大会，并在公祭大会上发表了激昂悲壮的演说，深深打动了到会的五千余人，江阴人民反帝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二

1919年“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一批江阴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进步社团，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共产党组织。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通过《民国日报》广大征求党员，在丹阳第二高小任教的钱振标利用暑期到上海环龙路执行部，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介绍参加国民党，秋天回到江阴，借虹桥堍的昆仑学社征集国民党员40余人，并在华士发表《国民和国民会议》的演讲。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党员刘重民，张曙时受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委派到江阴等地物色建党对象。其后，钱振标在丹阳，周水平在川沙，陈叔璇在无锡分别参加共产党。5月16日，云亭小学教师孙选（又名孙逊群）在上海小沙度参加共产党，江阴被批准建立中共江阴支部，由孙选担任支部书记，属中共上海地委领导的江浙外埠11个支部之一。5月29日，中共上海地委讨论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江苏省党部的工作，孙选被指定为国民党江苏临时省党部委员。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共江阴支部联合各界群众团体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

进行罢课、罢工、罢市、游行示威活动。中共党员、上海大学学生张庆孚返江阴，在5000人公祭死难烈士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各界人民反帝爱国热情高潮。6月，中共中央特派员萧楚女特地到江阴云亭会晤孙选，检查布置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发展工作并了解国民党的情况。7月，中共党员、上海大学附中教员周水平奉命回江阴，与孙选一道推动组建国民党江阴临时党部，在澄南小学创办《星光报》，引导人民大众参加国民革命。因此时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国民党组织处在半公开状态，共产党处在秘密状态，《星光报》只能采取夹在县党部办的《新江阴报》内分发。它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思想，实际是中共江阴党组织领导下的第一张党报。

1925年8月21日，中共上海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又称江浙区委），下辖上海及江苏、浙江两省一市党组织，江阴支部派代表参加了上海区委第一次会议。1926年4月，中共江阴支部上升为江阴独立支部，孙选担任江阴独立支部书记。江阴独立支部此时为上海区委所属15个独立支部之一，成为江阴宣传、教育群众、团结广大劳苦大众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战斗堡垒。

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在以孙选为首的中共江阴独立支部领导下，秘密组建了以共产党员和左派力量为主体的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工农群众运动得到发展。3月21日，由江阴县农民协会、国民党江阴县党部组织群众列队在学院场门前欢迎北伐军进城，各乡农民协会自动到城里参加欢迎的达六七百人。接着在公共体育场（现中山公园东南部）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庆祝北伐胜利大会，由孙选致欢迎辞，北伐军代表讲话，会后游行。

随着北伐军的进驻，县农民协会正式对外办公，地点设在中街关帝庙（现人武部）内，为了推动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3月22日，在君山大校场召开了规模盛大的江阴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来自城区的各界群众、中小学生、各乡农民代表和近郊农民共万余人参加。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选在会上做了演讲，号召农民群众参加农民协会，行动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当孙选激昂地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反动军阀和地主豪绅的罪行时，听者无不动容。会后各区、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县农民协会发布“禁止赌博、禁吸鸦片、禁演淫戏、禁宰耕牛、禁放高利贷”等布告。当地贫苦农民自动把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扭送到农民协会处理，遇到纠纷也都到农协评理解决。全县城乡大有“一切权力归农会”之势。

在此同时，江阴相继建立了工人协会、商民协会、青年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和教育协会等群众组织。都接受中共江阴独立支部领导。因这协会设在大街通往公共体育场的观音寺巷里，为纪念民众运动的掀起，就将观音寺巷的名称改为民运巷，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以孙选为首的中共江阴独立支部领导工农群众，于1927年3月19日，从军阀残余势力手中夺取了江阴城，21日以欢呼和掌声，迎接北伐军的进驻。但好景不长，窃取北伐军总司令职务的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

革命政变，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6日，江阴风云突变，开始清党。十四军一师师长熊式辉下令解散左派控制的国民党江阴临时县党部，成立右派组成的改组委员会。封闭县农民协会，禁止一切工农群众运动，对农民自卫军强行缴械。孙选、陈叔璇等遭到通缉。一些土豪劣绅认为时机已到，对革命群众实施报复，后塍的大地主吴阮琴、劣绅俞道聘等以“共产党”的罪名，向国民党江阴县政府告发刚当选为后塍农民协会会长的田圩小学校长茅学勤，并将他拘捕入狱。徐逸风在南沙家中，也被抓到江阴关押。一时江阴的监狱关满了工农运动的骨干、积极分子，共产党员朱士能在乡间被劣绅暗杀，江阴的革命群众运动遭受镇压而走向低潮。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此时，留在江阴农村积聚力量的陈叔璇、陈宇忠主动寻求省委指导，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把江阴列为全省农民暴动的重点地区。在批准江阴10月10日成立县委的同时，特派临时省委委员钱振标回江阴担任县委书记、省农运特派员。他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江阴国民党的创建人，曾受李大钊派遣以中共特派员身份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从事政治工作，“宁汉合流”后返回江苏，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革命者。他与陈叔璇、蒋云和农运骨干朱松寿等会面，介绍因“证据不足”刚从狱中开释的茅学勤参加共产党，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经过反复讨论，决定选择离城较远、农民运动基础较好、没有警察分局的后塍作为突破口，夺取敌人武器，得手后再运用游击战法，逐个解决杨舍、华士、顾山、长泾等乡镇守敌，然后与无锡的东北乡联成一片。为此，钱振标着手抓了几次准备工作：一是利用10月15日顾山沈舍里庙会，澄、锡、虞三县交界农民来这里赶集之际，召开万人规模的周水平烈士追悼大会，唤起民众；二是假借茅学勤家举办“路头酒”名义，邀请各地农运骨干到后塍商讨暴动计划；三是组织后塍、周庄、云亭、长寿等地的农民和长山采石工人百余人，成立江阴农民革命军。由钱振标（化名高大鹏）任总司令，茅学勤（化名王天民）任副司令。在1927年11月15日晚，于后塍拉开了江阴城区五次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

10月15日晚上，在钱振标的领导下，由茅学勤、陈叔璇、朱松寿分率后塍、云亭、长寿农民百余人携带刀棍长矛，埋伏在后塍通兴桥北堍一间临时指挥所左右，伺机而动。城区的地下党事先从国民党江阴市政局借到一支6寸手枪两颗子弹给钱振标，此时已派人在县城东10里的金童桥将电话线割断。午夜1小时许，钱振标下令一部分农民守住外围，他和茅学勤带领后塍农民分两路悄悄包围公安分局所在地法水庵，岗哨鸣笛告警，茅学勤佯称有事找局长，机警地上前解除了他的武装。钱振标挥枪当先，手握刀棍的农民高喊：“冲啊！杀啊！”蜂拥而入，冲到警察的卧室之中。警察已有准备，但慑于暴动农民的声势，加上分局长外出，不敢开枪。农民上前缴枪，打伤了两名企图抵抗的警察，缴获1支手枪、7支毛瑟枪、一批子弹及刺刀、警服等。农民欢呼雀跃，向空中鸣枪40多响。接

着，乘胜冲进禁烟检验所，砍伤 1 名持枪阻挡的执勤护缉队员，缴到毛瑟枪 1 支。

夺枪成功后，农民们高呼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拥往南街乡行政委员、劣绅俞道聘家，不料俞进城未回，就将搜出的田契、借据、租薄连同房屋一起烧毁。凌晨 3 时，队伍撤离，临行前张贴革命委员会和农民革命军的布告和标语。成功地打响农民暴动的第一枪。

后塍农民暴动首战告捷，江阴国民党当局一片慌乱。第二天清晨，县公安局长张品泉奉命率警察三个排，会同驻澄十三军一师二团的 3 个连，赶往后塍等地“围剿”，见农民战士们已安然转移，就烧毁茅学勤家的房子，拘捕他的父母和哥哥毛学友以及其他农民 20 余人。后毛学友遭严刑审讯，折磨致死。

钱振标等在周庄获悉，立即召开会议，果断决定由茅学勤连夜调集沙洲、云亭、长寿、周庄、长泾等地的农民近 3000 人，配备驳壳枪 4 支，手枪 3 支及一部分土炸弹，其余均为大刀、长矛、铁叉、棍棒。21 日凌晨 3 时会合，由百余名农民战士担任主攻，分东西两路直取目标，其他农民守在外围，一面呐喊，一面在火油箱内放鞭炮，以壮声势。经过两小时激战，公安分局和电灯厂先后被攻克。朱松寿等 3 人被救出。这次暴动，共毙警察 6 人，缴获毛瑟枪 3 支。清晨 6 时，农民队伍分路胜利转移。

三

两次后塍暴动告捷，鼓舞着农民群众的斗志。江阴党组织发展较快，党员数增至千人左右，在农运骨干的带动下，各乡农民协会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工厂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在此基础上，中共江阴县委于 1928 年的 1 月初，选择周庄东北 3 公里许的耿家住基小村庄，借眼科医生何瑞金家，召开江阴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当时，周庄是江阴农暴的中心区域，耿家住基地处周庄、华士和后塍三镇交界，环境隐蔽。何瑞金家有十间两侧，会场就设在西厢房里。当天吃夜饭时，客厅里满满地坐了 4 桌。出席这次会议的共 30 余人，由江阴党和农民武装的领导骨干，在江阴城区妇女界的夏静波和利用纱厂工人王阿松等，均特地赶来参加会议。晚上，会场正中挂了一盏马灯，光线不太亮。会议由蒋云主持，他分析了“四一二”政变后江阴党组织遭受的挫折以及“八七”会议以来恢复和发展的状况。总结了后塍两次农民暴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从游击式暴动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大会选出了以蒋云为书记的新一届县委领导机构。此时，钱振标已当选为省委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兼任江阴军事委员会主任，主要负责军事工作。陈叔璇、茅学勤、朱松寿、陈宗全、倪培青、徐江萍等县委委员，俞静嘉为候补委员。会议决定组建工农苏维埃委员会，将农民革命军队改为江阴红军，下按地区分设东北路、东路、南路、西路 4 个大队，由茅学勤统一指挥。

党代会结束后，各区委相继成立，并建立基层大队，在农暴区域的云亭、长寿、周庄、申港、夏港、沙洲等部分乡村，组建了苏维埃政权。

为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秋收起义的号召，中共江阴县委领导后塍、杨舍、峭岐等地大规模举行的农民暴动，最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武装坚持一年

多，率先亮出了红军旗号，意义是重大的。在斗争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分子，其中担任县委、市委、特委、省委领导职务的就有十余人。多数人壮烈牺牲了，有部分奉命转移到通、如、海等地区，充实红十四军，继续进行战斗，有的以后成为江阴抗日武装中的骨干。

四

在中共江阴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江阴利用纱厂 1300 多名工人举行“五卅”大罢工，历时三天，在江阴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 年春天，江阴利用纱厂资本家由于本地原料不足，外棉价格又提高，为转嫁经济负担，就采取开除 9 名工人的办法，并对留厂的工人也日益苛刻的办法，因而激起工人的反抗。为维护工人权益，中共江阴县委决定以要求增加米贴为由，由利用纱厂借纪念“五卅”惨案五周年的时机，发动全厂工人罢工。5 月 20 日，又以工会名义派代表向资方经理兼厂长王翼云提出，要求厂方增加米贴。同时提出实行劳动三八制。礼拜天双工，女工要有产假，并要求办工人食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 12 条要求，但这都遭到资方的拒绝，这激起了工人们的不满。

5 月 30 日早晨 6 点，正值日夜交班的时候，1300 多名工人汇合在一起，7 时正，约定的罢工时间到了，女工金宜度等分头在个车间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任瑞生以利用纱厂工会主席名义宣布了这次大罢工的目的要求后，全厂所有机器都停止运转。

罢工不久，国民党江阴县长李冷，公安局长李宗纲、江阴要塞司令杨允华等紧急带领军警、商团 700 多人将厂房团团包围。工人们毫不退缩。后由县党部委员出面，要工人推派代表与资方谈判。工人们随而推出任瑞生、李俊山、袁阿妹等 12 人前往谈判。重申 12 条要求，但资方毫无诚意，谈判陷入僵局。中午 12 时，1300 多名工人在金宜度带领下，涌出厂门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先经北大街再从老北门转向城内大街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并散发《告父老书》等传单，并列队到民运巷底的体育场集会。这时，县长李冷以“五卅戒严禁止集会”为名，出动军警当场逮捕 15 名工人，并将 12 名谈判代表押至公安局审讯。后怕造成更大风潮，宣布除任瑞生、李俊山继续严诘外，其余人分别释放。31 日，工人们继续罢工。6 月 1 日，城区地下党组织巧妙地散发了大批声援利用纱厂罢工的传单。反动当局大起恐慌，资方故意在报上放出空气：“一待复工，两名代表即可获释，条件问题可再进行谈判，酌情解放。”工人迫于生计，同意暂时复工。此时，资方却公然开除 40 余名罢工的积极分子，同时伪造现场，以车间查出“私藏军火”的罪名，对任瑞生、李俊山进行政治迫害。任、李两人在酷刑下，坚不屈服，5 个月后才获开释。

利用纱厂罢工后，金宜度等一批女共产党员因城区党组织的郑潮湧（即张志强）护送上海，进江苏省委训练班学习。任瑞生、李俊山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利用纱厂“五卅”大罢工，显示了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揭露了反动当局的丑恶嘴脸，也使利用纱厂的党组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作者：江阴市原文化局局长）

郑觐文对民族音乐的贡献

◎ 陈正生



在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史上，郑觐文应占有重要的地位。郑觐文不仅是一位民族器乐演奏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也是一位民族乐器制作家。他对古代音乐的探索，对民族乐器的改革，对民族乐器制作规范的建树，以及对演奏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全方位的贡献，对大型民族乐队的组建，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组建的 30 多人的大乐队，无疑是现代民族交响乐团之滥觞。

郑觐文（1872—1935），江苏江阴人。自幼酷爱民族音乐，30 多岁时，任江阴庙堂音乐助教。他对民族音乐作出重要贡献，乃是来上海创建大同乐会之后。刘天华是现代民族音乐的一面旗帜，郑觐文也同样是现代民族音乐的一面旗帜。郑觐文是江阴人民的骄傲，也同样是上海人民的骄傲；郑觐文所作所为，是对海派文化最好的诠释，郑觐文是弘扬海派民族音乐文化的先锋。

辛亥革命以后，郑觐文来到上海。由于他熟知古乐，被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学校（1919 年春改为仓圣明智大学）聘为古乐教员，其后又被圣玛利亚女学聘为古乐教员。此时的郑觐文，已不满足课堂里教几个女学生，他要面向社会。1918 年，郑觐文与其堂弟郑立三共租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004，开办琴瑟学社。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郑觐文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迪，当月即果断地将“琴瑟学社”易名为“大同乐会”，挂出了“大同乐会筹备处”的牌子。郑觐文为大同乐会制定了“研究中西音乐归于大同”的宗旨。在研究方法上，郑觐文则主张“对于西乐主专习，对于中乐则主稽古与改造，务使中西方得相济互助之益，然后撷其精华，提其纲领。”这一“筹备”阶段于 1923 年底才算完成。

郑觐文在大同乐会建立初期即设立三个部：研究部、编译部和制造部。研究部又分理学和技能二科。理学所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有中国律学、韵学、雅乐谱、俗乐谱、西乐谱、西乐辞典和中西诗歌等。技能所学习的内容为中西乐器演奏、中西歌曲唱法、东方古舞和西方舞蹈。编译部旨在编译各种乐书和乐谱。制造部的任务当然

是制作乐器——包括西洋乐器。筹备如此完善的民间音乐团体，不仅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此后迄今也未见有过；专业的音乐院校也鲜见。就以制作乐器来说，1932 年大同乐会就出售过自己制作的小提琴（Violin）和尤格利利（小吉他）。如此繁重的工作，郑觐文深知“非少数学力所能逮，愿与海内外同志通力合作”。郑觐文身体力行，因此团结了一批深有造诣的艺术家，如早年教歌舞的欧阳予倩，教琵琶的汪昱庭、吴梦飞，教京剧的陈道安、苏少卿，教昆曲的杨子咏。郑觐文自己则教琴瑟。

郑觐文不仅能团结如此众多的音乐家，而且全力奖掖后学，基本会员不收会费，并鼓励相互之间的互帮互学，因此培养了王叔咸、程午嘉、柳尧章、郑惠国、卫仲乐、金祖礼、许光毅、许如辉、陈天乐、秦鹏章……等一批深有造诣的音乐人材，其中更不乏精通中西乐器者。

1925 年，柳尧章还只是个 20 岁的青年，郑觐文深知他富有才华，竭力鼓励他成功地改编出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此曲一出，社会上的反响就十分强烈，认为不听此曲当引以为憾。1927 年，柳尧章又挖掘、整理出已经绝响的《霓裳羽衣曲》（即《月儿高》）。郑觐文初闻柳尧章的演奏，竟然惊呼“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欣喜之情，溢于言表。1926 年，孙传芳在南京搞“雅歌投壶”，大同乐会 50 余人应邀乘专车赴宁，郑觐文就全权委托柳尧章组织、安排演出事宜。1929 年卫仲乐加入大同乐会，郑觐文对卫仲乐倍加赏识。1933 年 4 月 9 日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彩色纪录片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独奏节目只有郑觐文的古琴独奏《水仙操》和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同年 5 月 21 日晚，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和大同乐会在刚刚改建成的大光明电影院，举办首次公开的中西联合音乐会。大同乐会的单独节目仅两个：合奏《国民大乐》和卫仲乐琵琶独奏《十面埋伏》。音乐会上，卫仲乐一曲《十面埋伏》艺惊四座。不久，郑觐文即提拔卫仲乐担任大同乐会乐务副主任。由此可见，郑觐文不仅有识英才之慧眼，更有大胆起用青年的卓识。

此外，郑觐文于制造仿古乐器，改良民族乐器，组建民族乐队，以及编著乐理书籍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绩，作出了卓绝贡献。

郑觐文制作仿古乐器，起始于任教仓圣明智学校期间。当时郑觐文已将复制的竽、埙、篪、大瑟、大小忽雷、筚篥等，用于古乐演奏。1923 年还支持欧阳予倩还将这些仿古乐器搬到他编导的京剧《徽钦二帝》的舞台上。浙派古筝演奏家王巽之由杭来沪，即参加大同乐会的活动，并受大同乐会影响，努力进行埙和箫的制作研究。同样，筚篥的复制研究也起始于大同乐会郑觐文的倡导。1919 年苏州的“怡园琴会”，郑觐文除与李子昭双琴对弹而外，就演奏了大瑟与筚篥。此外，1931 年 9 月 5 日在中华俭德会筹赈全国水灾游艺大会上，柳尧章也用筚篥独奏了一曲《月儿高》（《霓裳羽衣曲》），可见当时筚篥的演奏技巧已相当完善。

在哈同花园里复制古乐器，得受制于人，郑觐文当然不能尽力施展。大同乐会成立以后，郑觐文便专心致志地营造这批仿古乐器。尽管多方面筹集资金，仿古乐器的制作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史量才在《申报》刊文呼吁，收效仍然极微。面对如此窘境，郑觐文毫不气馁。1930 年 6 月，终于得到教育部特批，拨南京新发现的南宋古木中的大部分予大同乐会，促成了这套仿古乐器于 1930 年底完工。据《申报》报道，这次制作的全套乐器计 163 种，其中弓弦乐器 20 种，弹拨乐器 35 种，吹奏乐器 43 种，敲击乐器 60 种，并附有音律乐器 5 种。这套乐器制成后，陈列于福开森路世界学院礼堂（今武康路 393 号）供人参观。

关于郑觐文所制作的“仿古乐器”，实际上乃是古代乐器、现存的民间乐器、少数民族乐器和部分创意乐器之综合。但郑觐文所制乐器究竟有多少种，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中国音乐史》中所载为 161 件，拍摄《东方大乐》时有人说摄入影片中的有 180 种，如今存留下的乐器照片和实物，约有 170 种。由此可见其乐器制作工作之恢宏！

郑觐文制造仿古乐器，并不拘泥于古制，其中颇多革新。为了克服古琴音量小的缺点，1924 年，郑觐文就研制过双层面板的“增幅琴”，1926 年又制作了音量比古琴大一倍以上的五弦“虞琴”（史籍载，琴为虞舜所造，五弦）。1924 年，郑觐文制作出 36 弦“洒瑟”和 50 弦“庖羲瑟”。郑觐文在瑟上的改革有二：一是将瑟的一弦一柱，改成类似扬琴的排马，用以防止鼓瑟时柱与瑟的面板碰击而发出杂声；二是在瑟上装上轸轴，将弦的首端栓于轸轴之上，以利调节弦的松紧。如今制作古筝，排马虽然未被采用，而弦轴在被改进后沿袭了下来。为了符合时代的需求，郑觐文于 1931 年之前就制作了 6 项 18 品的琵琶（葫芦琴和五弦琵琶）。为乐队声部需要设计制作了中音乐器弓胡和低音乐器幢琴。

对于常用乐器笛子的制作研究，郑觐文亦耗费了不少心血。我国旧有的传统笛子为均孔，即各孔的间距几乎相等。这种形制，最迟始于汉魏时期，一直沿用下来。为着合奏的需要，郑觐文于 1929 年首先按国际标准音 A 制成律吕式的十二调笛。所谓律吕式笛，乃是以三分损益律确定各孔之间的音程关系。实际上律吕式调笛的各孔之间的音程关系，与如今普遍采用的十二平均律的笛子相差甚微。郑觐文又考虑到笛子的音高同管长成反比例的这一事实，又琢磨研制成管长能够伸缩的调音笛。此笛后由罗松泉完善，一直沿用至今。郑觐文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制作了十二音箫笛；十二音箫的制作早于今虞琴社的彭祉卿（彭制“雅箫”仅能奏十音），而十二音笛则更早于丁燮林上世纪四十年代制作的十一孔笛。再如郑觐文制作的篪，所遵循的是朱载堉《乐律全书》中的制作方法，但增添了两个拇指孔，由七孔增至九孔，使篪原先只有一组音成为能奏音阶连贯的一组半音。

为创建新型乐队，郑觐文亦作过多次探索与努力。1924 年 4 月 27 日，郑觐文首次组建了

具有 30 人规模的女子乐团。女子乐团分歌、舞、乐三个队；乐队分弦乐、管乐、簧乐和打击乐四个组。女子乐团于 1924 年 6 月 8 日演出于市政厅，深获好评。当时德国驻远东代表林台博士，观看了这场演出之后，不仅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订购了八件仿古乐器运往德国供人参观。这支乐队的基本力量是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女子大学的学生。1924 年夏，仓圣明智女学亦继男学之后停办，女子乐队也就于无形中解散。当时郑觐文就想组建一支 30 人规模的男子乐队，未能如愿。

1925 年《春江花月夜》改编成功，1927 年《霓裳羽衣曲》（即《月儿高》）被挖掘整理出来。柳尧章对这两首曲子虽然作了编配，演奏形式也有所改变，但演奏规模也不过十人左右。1928 年 5 月，郑觐文采纳柳尧章的建议，意图组建包括大同乐会、汪氏琵琶研究会、霄霓乐团、韩江丝竹社、琴侣斋、精武体育会国乐组、中华音乐会、辛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国乐组等十个团体的国乐联合会，意在组建 40 人规模的大乐队。后因分声部、定谱、视奏等意见难以得到共识而流产。因为上海的其它民间乐队很少有大同乐会会员识工尺谱、简谱，又识五线谱的能力。此事促使郑觐文下定由大同乐会单独组建大乐队的决心。该年夏、秋之交，大同乐会即向社会招收乐队队员，大乐队很快组成。该乐队有 30 余人，分吹、拉、弹、击四个乐组，高、中、低三个声部齐全，并编排了五个乐章的《国民大乐》。1930 年 1 月 17 日，上海拒毒会在市政厅举办游艺会，大同乐会的《国民大乐》首场演出。拒毒会还特为《国民大乐》拍摄了记录片。可惜此片为内部资料片，鲜为人知。此后的 1933 年 4 月，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国民大乐》易名的《东方大乐》拍摄了记录片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知名音乐理论家沈知白先生就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的彩色纪录片内容丰富，除郑觐文古琴独奏、卫仲乐琵琶独奏，以及 9 人合奏的《春江花月夜》、32 人合奏的《东方大乐》而外，据说还收入了全套仿古乐器。这套纪录片，无疑是民族音乐研究极为宝贵的资料，希望有关方面能全力寻找。

1933 年 5 月 21 日，大同乐会同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在刚改建成的大光明电影院举办中西联合音乐会。大同乐会又奏《国民大乐》。音乐会后，郑觐文深感这支大乐队的阵容和音响，远远不及管弦乐队，打算进一步扩大乐队的规模。但因时局动荡，郑觐文未能如愿。

郑觐文于理论研究亦颇用功，编纂并发行了《雅乐新编》、《箫笛新谱》和《中国音乐史》，此外还完成了《中西乐器全图考》的编纂。《雅乐新编》，乃是转自《朱载堉全集》中辑录朱熹《经传释词》中保存的唐代《诗经》“十二诗谱”，将其译成简谱，以供学堂作为乐歌之用。《箫笛新谱》除了阐发箫笛之不足，以及改良方法，从而保证箫笛制作有稳定的音高和音准而外，主要是用简谱形式介绍了一批民间乐曲，并借助乐谱阐述少有人懂得的传统的律调关系。《中国音乐史》是一部鸿篇巨著，

凡古代的乐人、乐事、乐论、乐律、乐器、乐歌、乐舞，无不囊括殆尽，并对音乐史中的疑难问题作了阐发；附编还介绍了我国当时民间曲艺和主要戏曲剧种，以及民间及周边邻国的乐器。此外他所编纂的《中西乐器全图考》于1929年完篇，1933年蔡元培为郑觐文的《乐器图说》作序。笔者从书名的变更判断，《乐器图说》理当就是《中西乐器全图考》删弃了“西乐”部分。从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和“仿古乐器”制作判断，《乐器图说》更应该是胜过《中国音乐史》的鸿篇巨著。该书重点不在“图”，而在“说”——对乐器图录的详细讲解：历史考证、制作尺寸和演奏要领。大同乐会当年留存下来的众多乐器照片，其中颇多人们无法深解的，本人深信《乐器图说》中必有说明。例如50弦的“庖牺瑟”，郑觐文曾著文简叙了定弦方法，可“百弦大瑟”不仅定弦，演奏方法更无从推断。今年“大同乐会百年纪念”会上，展出了金祖礼收藏的、署名郑玉荪编的《乐器图说讲义》，从内容分析，理当就是郑觐文的《乐器图说》内容。“七弦琴”（古琴）的介绍内容有6000余字，琵琶也是6000余字，箫笛有8000余字。从留存的这一鳞半爪就可足证，《乐器图说》无疑是我国“民族乐器学”的开创性鸿篇，其篇幅远超《中国音乐史》！

再就乐谱而言，郑觐文通晓琴谱、律吕谱、工尺谱、简谱和五线谱。他更对五线谱进行了分析，认定五线谱用于民族乐器有不便之处，因此发明了“七线谱”。据郑觐文讲述，七线谱乃是吸收了五线谱的长处，结合我国国乐界只熟悉首调唱名的实际而设计的。1931年夏，郑觐文还特地用七线谱译出古琴谱，让卫仲乐演奏，译出琵琶谱让柳尧章演奏，以此证明七线谱的适应性强。笔者曾仔细向卫仲乐和柳尧章二位先生讨教七线谱之事，可惜年代久远，二老已记不清细节。实际上若不对我们所传承的民族乐器进行改造，或不对现有的五线谱进行修订，五线谱是很难方便地应用于民族乐器的记谱上的。

（作者：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传统的未来，江博 5·18 奇妙夜再现

◎刘玉君

国际博物馆日定于每年的 5 月 18 日，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发起并创立的。这一天世界各地博物馆都将举办各种宣传、纪念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让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不同于过去静止不变的机构，当今的博物馆正在重新定义自身，变得更具交互性，以观众为中心，以创新为导向，更具灵活性、适应性和可移动性。它们成为了文化中枢，是创意与知识相结合的平台，观众可以共同创造、分享和互动。因此，2019 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

今年江苏省南京博物院向各兄弟院馆发出了盛情邀请，联动南京明孝陵博物馆、南京六朝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无锡博物院、镇江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江阴市博物馆共同举办了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博物馆奇妙夜。我们博物馆的活动策划分为三块：观看主题展览、欣赏舞台表演和体验传统手工艺与非遗项目，其间得到江阴市城西中心小学师生与旗袍社、汉服社、江阴市天华艺校等单位和江博志愿者们的鼎力支持，共同打造了精彩纷呈的“博物馆之夜”。在新的要求下，博物馆更加体现着体验式的功能。因此，夜间开放则更侧重于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观众深度赏游主会场。夜间开放从当日晚 7 点到 8 点半，在这一个半小时的短暂相约中，我们能给观众带来哪些富有博物馆特色的体验活动？怎样才能让博物馆迷参与到文化体验活动中来？这是我们策划活动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做了不一样的创新。

1、立足博物馆职能作用 发掘传统展览新内涵

精品邀约，特展在线。如今，走进博物馆观看展览、品鉴文物，已成为观众休闲时间的热门选择，博物馆为各位观众提供着文化给养。

除了常规展览的开放外，当天特设了四大新展，其中包括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主题展览《刘氏三杰》精品文物展、与厦门华侨博物院交

流的院藏雕刻精品展《巧工匠心》、表现历史深思的穆建英雕塑作品展《邂逅无言》、展现游圣徐霞客历经艰辛之路的中国书画展《绿水青山》。一件件展品诉说着它们的前世今生，更加敲响着现实的回音，带给观众视觉上的冲击与思想上的洗礼。

2、树立特色节点品牌 打造精品仪式感内容

古装穿越，舞台表演。活动旨在通过厚重的民族文化，让观众在知识性、趣味性的演绎中学习知识，对中华文明感兴趣，对家乡的历史文化更加了解，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

澄西薪传国学社带来了经典国学少儿吟唱《春江花月夜》，通过古诗词的传唱，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使生生不息的文字流动起来；由江阴市城西中心小学、一朝花开汉服工作室与江苏省旗袍会江阴分会等多家单位联合演绎的《从古至今服装秀》，通过从古到今主要朝代的服装走秀和礼仪示范，解读历朝历代古装的穿搭方式，将精妙的传统服饰文化印迹跃然身上，深入人心。在体验中升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加强纺织之乡的文化认同感，展示了民族服饰的繁星璀璨与中华礼节的上下传承，从服饰变迁中走过民族的繁华盛世，从文化复兴中沐浴礼仪之光；天华艺校国际部的孩子们带来了笛子与笙合奏《扬鞭催马运粮忙》、二胡曲《携手光明行》，通过江南丝竹乐器声的回响，聆听民族音乐宗师刘天华的经典力作，守护民族音乐之魂，涵养江阴精神。整台演出使得历史真实生动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让书本知识活化于心，触动心灵。



江苏省旗袍会江阴分会的老师们展示旗袍之美



天华艺校国际部的孩子们演奏二胡曲《携手光明行》

3、创新文博教育方式 丰富社教活动载体

文创体验，现学现做。博物馆的社教工作任重道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人群，我们一定要在创新上勤探索，在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运用主题鲜明的社会教育手段，相得益彰地满足各种类型观众的需要。

“簪簪自喜”发簪制作，结合我们博物馆馆藏文物中的金器头饰，延伸出来的发簪制作项



观众现场体验发簪制作

目吸引了众多女性观众的注意，活动旨在探寻古代女子的审美追求，体验大国工匠的精益求精和艺术审美；“衣版衣眼”雕版印刷，按照江博的文物图案特别制作的雕版印刷模板还原了原汁原味的古代印刷术，在当晚的电视直播连线中进行了集中展示，给电视机前的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拈花一笑”花钿剪纸，在唐代盛行的花饰曾是女子脸上美的标记，没有花钿的妆容是不完整的，观众们亲手剪出各式各样的花钿贴于眉间，也感受着大唐的风采；“衣冠楚楚”汉服折纸，汉服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传统代表服饰之一，通过折纸艺术，大众不仅了解了汉服文化，也结合时下环保的理念，倡导爱惜纸张、变废为宝，引导孩子传承绿色希望；“衣心衣意”白T手绘，观众根据当晚的观赏与体验将无限创意绘就在笔下，穿上自己独创的体恤衫，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掀起新的国潮。



江苏台融媒体新闻中心荔直播联合地方台新媒体现场直播

4、抓住宣传良好契机 紧扣时代发展脉搏

媒体搭桥，美美与共。在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既要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也要加强联结各种新媒体资源，共同挖掘文物内涵，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让沉闷的博物馆热闹非凡。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9年各家博物馆联合策划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博体验活动的同时，由江苏台融媒体新闻中心荔直播联合地方台新媒体部门共同推出5·18国际博物馆日——《传统的未来》网络直播，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九个馆的活动，给观众“新中式”的视角，在博物馆中发现未来。除了此前的公众号预报和展馆内现场海报的宣传外，融媒体的加入起到了二次宣传的作用，让社教效果向更大范围辐射。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战略任务。到2020年，努力形成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社会。而博物馆在大众社会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青少年在学校之外的第二课堂。博物馆通过守护一个城市的发展记忆和收藏城市的悠久历史，细细描摹着城市生活的文化脉络，形成一本“立体教科书”，人们在这里启迪智慧，获得知识，增强了对美的热爱、欣赏，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活动的现场参与者将近200人，这是我们馆开馆以来社教活动中创下的一个新数据，相信在下一届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时，会有更多的博物馆迷走进场地体验，通过手工、文博小课堂等形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共同谱写博物馆的社教故事。

（作者：江阴市博物馆陈列开放部）

从非遗展品看燕京八绝

◎ 沈晓燕



图一　燕京八绝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

2019 年 10 月，由江阴市博物馆引进的《匠心筑梦——燕京八绝》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传承已久的手工艺品。

此次展览展出的 164 件 / 组非遗展品都为燕京八绝。燕京八绝（图一），即景泰蓝、玉雕、

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京绣八大工艺门类，它们充分汲取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并逐渐形成了“京作”特色的宫廷艺术。自元代定都北京，历朝历代都把全国最优秀的工匠集中到此地，这大大地提升了北京地区的手工艺水平，尤其到了清代，更是开创了中华传统工艺的心得高峰。其中这几种工艺有最具有典型宫廷特色，后来被冠之以“燕京八绝”之美称。

以下让我们跟随时光的脚步，走进江博为大家带来的“燕京八绝”的世界里，去观赏皇家审美与民间智慧的结晶，去享受一段悠远、雍容、匠艺合一的京韵之旅。

一，景泰蓝。中国的著名特种金属工艺品之一，到明代景泰年间这种工艺技术制作达到了最巅峰，制作出的工艺品最为精美而著名，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故后人称这种瓷器为“景泰蓝”。景泰蓝正名“铜胎掐丝珐琅”，俗名“珐蓝”，又称“嵌珐琅”，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经过高温烧制，磨光镀金而成。制作中既运用了青铜和瓷器工艺，又融入了传统手工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古代的工艺中，绝大部分技艺都是上行下效，宫廷与民间并存制作。然而，景泰蓝这种工艺一直到清末同光中兴之前都为宫廷独有，并禁止民间私自生产。2006 年，景泰蓝被国家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子孙万代葫芦（图二），这件子孙万代葫芦的景泰蓝图案为海波纹，其寓意之一为理想和美好：一朵朵的浪花层层叠叠，无穷无尽，会永恒持续下去，所以象征祈求永恒不灭的心愿，类似于我们日常所说的“天天开心，要一直幸福下去”诸如此类的祝福；寓意之二为到达彼岸的心愿寄托：有些国家有将死者水葬的习惯，所以也可以将到达彼岸的心愿寄托在这个纹样，希望自己的某种祝福能实现或者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达到某种结果或目的的意思。总结两层意思，这个纹样既包含对美好过程的祝愿，也代表了对美好结果的期盼。



图二　子孙万代葫芦

再看其葫芦造型，“葫芦”与“福禄”谐音，民间常用葫芦来表示福禄。枝叶繁茂、多果的藤蔓与多子的葫芦表示“子孙万代，繁茂吉祥”；葫芦可渡水、入药，也是暗八仙之一，寓意为健康、长寿、平安。因有很多民族认为葫芦是人类的始祖，同时在很多神话故事里，葫芦与神仙和英雄相伴，被认为是可以带来福禄、驱魔辟邪的灵物和保宅护家的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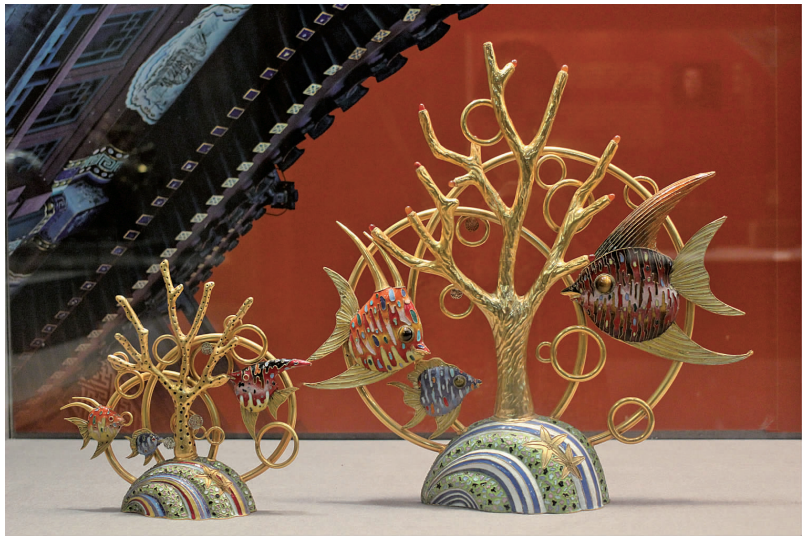


图三　山水瓶

山水瓶（图三）。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从这对瓶子的山水画中，我们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另外，这是一对非常有难度的景泰蓝作品，按照景泰蓝传统工艺，一定要在掐丝之后再填色，一个掐丝里面一种颜料，而这一组梅瓶上的山水画颜色是要靠晕染出来的，有深浅变化，有颜色变化，这样的工艺是大师的独门秘籍，一般工艺师是很难做到的。

这组山水瓶的造型也是别具一格，一个是口小、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瓶式，是典型的梅瓶瓶式。另一个是口大、溜肩、腹圆、圈足的瓶式，很特别，具有现代感。两只梅瓶虽为一正一反，但整体和谐，造型挺秀、俏丽，宛如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像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互补的、促进的、和谐的。

海底世界（图四）。海底世界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美轮美奂。这组景泰蓝海底世界便是运用了海底元素，闪着金光的珊瑚矗立在海螺造型的“岩石上”，摇曳的枝叶串联起一条条彩色的鱼和气泡，让人感觉像是到了梦幻般的七彩海底世界。



图四　海底世界



图五　喜凤瓶

喜凤瓶（图五）。景泰蓝以象征福瑞的百鸟之王凤凰和象征富贵的百花之王牡丹为主题，双凤环绕雍容华美的牡丹花翩翩起舞、互相追逐，一派喜庆景象，还有双凤呈祥、花开富贵之寓意。凤凰长尾随风而摆，飘然如瀑，其色彩之绚丽，如虹胜霞，其双翼之风羽层层叠叠云排而上，一曲一放张合有度，其曲者蓄势万钧，放者挥洒如云，有乘风而上之势。整体瓶型更是婉转清秀，优美动人，如月夜之下，翩然起舞的绝代佳人。作品造型与图案相得益彰，凤凰似与瓶合为一体，表现了大师对美的极致追求，超凡脱俗，气质卓然。

心语（图六）。这件作品造型优美，两只天鹅相对而立，呈心形状，给人以视觉及心灵的双重美感，故名为心语，亦是发自心灵的心声。周身饰以现代花纹，几何图案，颜色绚丽多彩，极具青春时尚、追求爱情的现代美感，这正是属于新一代年轻人的心语。



图六　心语



图七　百年好合

百年好合（图七）。百合花素有“云裳仙子”之称，由于其外表高雅纯洁，取“百年好合”、“百事合意”之意！景泰蓝百年好合作品以盛开的百合花缠绕瓶身，吸引而来的蝴蝶在翩翩起舞，在景泰蓝装饰手法上是一大创新，开创先例！

鱼舞天骄（图八）。2014 年，作品“鱼舞天骄”景泰蓝以创新造型荣获第 113 届法国斯特拉斯堡列宾竞赛创新“金奖”，美国纽约国际艺术博览会及世界华人艺术精品大展杰出艺术成就奖两项国际大奖。

鱼舞天骄景泰蓝整体造型导入西方设计美学“黄金比例”的概念，在造型设计上大胆创新，融入现代欧学设计元素，用灵动突破传统景泰蓝，高约 46 公分，宽约 26 公分；是景泰蓝与玛瑙玉石结合的时尚景泰蓝艺术品，飘逸的鱼尾朝天而上，底部大鱼俏皮的神情朝上而望着红玛瑙珠，引人霞想不已；上端的小鱼则对映红蓝色宝螺贝壳，双双相映成趣，大师所要表达的韵味，其意义是轻松的、是活泼而愉悦的、是充满梦幻般的美好与美丽，另人百看不厌而另人激赏。



图八　鱼舞天骄



图九　鼎盛中华

鼎盛中华（图九）。鼎盛中华为三足方耳圆身宝鼎造型，鎏金天坛为顶，上拱祥云元宝，精雕祥龙护足。鼎身一共镶嵌 60 颗宝，鼎足鎏金龙头 6 颗玛瑙石为角，6 颗木变石点睛。该作品结合了景泰蓝技艺、鼎文化和生肖文化，是传统文化在大题材上的大制作。

鱼跃瓶（图十）。其造型采用中国传统瓶形，瓶身有两尾肥美的鲤鱼，并分别辅以水草、小蝌蚪等环绕四周，整个作品做工精细，色调明快，协调，生机勃勃，寓意着人们的生活富裕、美满。

二，玉雕。玉雕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玉石经加工雕琢成为精美的工艺品，称为玉雕。工艺师在制作过程中，根据不同玉料的天然颜色和自然形状，经过精心设计、反复琢磨，才能把玉石雕制成精美的工艺品。玉雕的品种很多，主要有人物、器具、鸟兽、花卉等大件作品，也有别针、戒指、印章、饰物等小件作品。在中国的传统玉作中，有“南玉”、“北玉”之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玉”，无论制作流程、器物造型还是构思设计，处处体现出一种“京城”特有的皇家风范和文化气息。西周时期，今地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附近的诸侯国——燕国王室皇族就享有非常丰富的玉雕制品；金元两朝的玉器讲究对称，善用镂空雕刻技



图十　鱼跃瓶

法。明代北京玉雕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期，或精致严谨，或粗犷浑厚，刀工刚劲有力，并多与大量高级宝石、金器相结合，呈现出奢华精致的艺术风格。2008 年，玉雕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金镶玉奖牌（图十一）。“金镶玉”是北京奥运会的奖牌设计所采用的式样，喻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玉良缘”，体现了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运动员的褒奖。它的设计方案，创意十分新颖，突破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奖牌设计单一材质的传统，又融入了典型的中国文化元素。



图十一　金镶玉奖牌

玉与金属的结合将采用特殊的工艺，可以保证玉石不会掉下来，满足佩戴、展示的需要。据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王沂蓬教授介绍，设计人员在玉环内部的边缘设计了一个缓冲带，但玉与金属之间还会发生碰撞。最后在中间添加了一种阻尼材料，液态的阻尼材料灌进玉与金属间的缝隙后固化，让玉与金属“严丝合缝”，并起到减震的作用。经过数十次实验，即便是从 20 米的高空摔下，“金镶玉”也能安然无恙。

三，牙雕。象牙是生长在大象头部上颌的一对门齿，材质细腻，表面打磨后光洁润泽，是非常卓越的工艺雕刻用材。大约 3000 多年前的中原大地，气候温暖湿润，黄河中下游还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草原以及庞大的食草霸主——象群。它们的存在开启北京王室制作象牙工艺品的历史，直至明清两代，牙雕的精华技艺专为帝王贵胄所有，长期被封闭在皇宫高墙之内。来自苏杭、广州等地的牙雕艺人和北京本地的工匠在彼此技艺的交融、借鉴以及帝王艺术趣味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北京地域特色的牙雕工艺，成为“北派”牙雕的代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出土的象牙梳是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的象牙制品，元代建都北京，朝廷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集中到京城，北京象牙雕刻业自此而兴，明代宫中专设牙雕作坊，清代北京的宫廷牙雕主要在如意馆和清宫造办处内完成，呈现出华丽、庄严、富贵、典雅的风格，成为了“北派”牙雕的代表。

108 罗汉牙雕（图十二）。牙雕雕刻的 108 罗汉，其寓意为祈望消灾去祸，避鬼驱邪，广纳



图十二　牙雕

财富。象牙因其牙纹为竖纹，所以雕刻时竖着雕刻为好。此牙雕为横雕，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加之其雕刻深度及深，最深的地方近象牙厚度的三分之二处，所以更是难上加难，再看其最薄的地方，如果没有把握好，整个作品都会被毁。这类作品制作风险比较大，成本也高。

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之中，大象种群数量下降超过 50%，野生象数量现在不超过 55 万头。猎杀大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取象牙。千百年来，象牙被用于制作各种物品，其中包括钢琴键、象牙台球、筷子、印章和其他一些奢侈的装饰品。人们只能从死掉的大象身上获得象牙，正因此人类开始猎杀大象。如果象牙贸易继续存在，大象栖息地继续减少，大象也将继续处于严重的危险当中。所以，现在大家要树立保护大象的意识，拒绝象牙制品贸易。

四，花丝镶嵌。“采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是为一绝”说的就是与皇家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花丝镶嵌工艺，从皇帝头上的冠冕，到后妃发间的金钗，再到王侯将相腰上的金丝软带，处处展示着这门宫廷绝技的华贵风采。又叫细金工艺，是一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它是用金、银等材料，镶嵌各种宝石、珍珠，或用编织技艺制造而成。花丝镶嵌分为两类：花丝，是把金、银抽成细丝，用堆垒、编织技法制成工艺品；镶嵌，则是把金、银薄片锤打成器皿，然后錾出图案，镶以宝石而成。商代北京就有了用金打造的臂钏、耳坠。春秋战国时期，工匠们制作出了细如发丝的金银丝，将其嵌入青铜器之上，成为“错金银”，这就是花丝工艺的萌芽。北京的金银手工制品在辽金时期得以发展，元明两朝设将作院和银作局，专门掌管宫廷金银等珍贵器皿、首饰的制作。从明代起，花丝镶嵌技艺已比较纯熟，还创新了点翠、烧蓝等技法，同时，金银冠饰也大量采用花丝镶嵌技艺进行制作，其焊接、编织、镶嵌技艺之高令人称绝，至此北京金银器吸收南北技艺之长逐渐形成了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宫廷风格。所谓“花丝万缕织金冠，妙手镶嵌有乾坤”，正是对这项精妙工艺的高度概括。2008 年 6 月 7 日，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蟠龙酒壶（图十三）。蟠龙是中国民间传说中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的形状作盘曲环绕。酒壶上暂刻两条蟠龙盘旋于大海之上，寓意



图十三　蟠龙酒壶



图十四　牛灯

吉祥。壶柄一条蟠龙首尾相应，造型优美，整个壶体镶有红绿宝石，更显奢华。

牛灯（图十四）。这件作品灵感来源于南京博物院馆藏东汉错银铜牛灯?。此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牛腹中空，其中的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灯罩上紧扣穹顶形罩盖，盖顶之上均匀弯曲的烟管与牛头顶上方凸出的短管紧密套接。当灯火点燃时，所产生的烟尘通过烟管导入灯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从而确保室内空气的清新。

如意（图十五）。“如意”是吉祥圆满的象征，它承托祈福禳安、招福纳祥等美好意愿，浓缩着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心愿。藉此祥瑞之物，恭祝万事顺心顺意，一生平安吉祥。花丝工艺，千载绝技，自古即为皇家御用。“花丝如意”，采用堪称天下工艺之首的花丝镶嵌工艺，打造出细如发丝的纯金金丝，手工编织，巧夺天工，成就不凡，造就了一款传世之奇葩。



图十五　花丝如意

五，雕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雕漆是中国传统民族艺术，至少有一千四百余年历史。横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在明清两朝还是皇家宫廷工艺器物，历来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艺术价值。雕漆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漆雕、剔红、剔黄、剔绿、剔犀、剔黑、剔彩、堆朱、堆漆，明朝中后期才统称雕漆。雕漆工艺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雕漆有金属胎和非金属胎两种，前者是珐琅里，后者为漆里。雕漆的颜色有红、黑、黄、绿等多种色彩，其中以红为主，所以雕漆又叫“剔红”。元代雕漆在工艺技法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对北京雕漆的启蒙、发展影响深远，明成祖朱棣酷爱雕漆，命御用监在皇城内设立了专为皇家服务的漆器作坊——果园厂（现在西什库东边），专门生产漆器。雕漆由此成为了皇家御用的官办手工艺，它的设计、制作、资金投入和器物的使用都由宫廷支持和掌控。北京雕漆造型古朴庄重，纹饰精美考究，色泽光润，形态典雅，并有防潮、抗热、耐酸碱、不变形、不变质的特点。雕漆工艺是中国漆工艺的一个重要门类，也是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的精华之一。

二龙戏珠宫缸（图十六）。二龙戏珠取自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龙珠被认为是一种宝珠，此雕漆作品运用二龙戏珠图案，表示吉祥安泰和祝颂平安与长寿之意。



图十六　二龙戏珠宫缸

二龙戏珠宫缸圆腹，平底，形制宏伟规整，其上用手工剔刻。剔红雕漆工艺源于我国唐代，盛于明清。其制法是先将调好的漆料涂在铜胎或木胎上，一般涂八九十层。上漆后趁未干透时立刻进行浮雕，然后再烘干、磨光。雕漆颜色以朱红色为主，鲜红艳丽、喜气洋洋，中国历代帝王有用之点缀宫廷的惯例。雕漆产地有北京、扬州、天水、歙县等地。其中以北京产品为最著名。

用雕漆制作的粉盒（图十七），造型古朴庄重，纹饰精美考究，色泽光润，形态典雅，并有防潮、抗热、耐酸碱、不变形的特点。



图十七　雕漆粉盒

这组雕漆粉盒，纯红色为剔红工艺，就是在胎骨上层层髹红漆，少则八九十层，多达一二百层，至相当的厚度，待半干时描上画稿，然后再雕刻花纹；黑红两色的为剔漆工艺，在胎骨上先用一种颜色漆刷若干道，积成一个厚度，再换另一种颜色漆刷若干道，有规律地使两种色层达到一定厚度，然后用刀以 45 度角雕刻出回纹、云钩、剑环、卷草等不同的图案。

六，宫毯。是富有北京地域特色和宫廷特色的手工艺制品，起源于宁夏，因其织结坚牢，毯面柔软，深得皇家权贵的青睐，自元代起，就成为皇宫的御用品，宫毯也就由此得名。北京手工织毯制作工艺考究，图案丰富多彩，因为过去曾是皇宫专用的御用品，所以又叫宫毯。北京织毯有地毯、壁毯、卧毯等多个品种，原材料以羊毛、丝线为主，织结坚牢，毯面柔软。以栽绒、盘金为核心技艺，经纬交错为毯身结构，其传自宫廷，承自民间，既有皇家韵味，也有满、蒙、藏各民族的文化特点，是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京式产物。元代的织毯业非常发达，元成宗时工部奉旨在大都青塔寺设立织作所，专门织造宫廷用毯。明代沿袭元代的织作工艺并有所改进，向精细多样化方向发展。从明永乐初期到清雍正晚期，皇宫曾经经历“凡地必毯”的辉煌景象。北京宫毯则以传统图案著称，融中国绘画、刺绣、织锦、建筑装饰艺术于一体，有京式、古纹式、民族式、锦纹式、花鸟式等等，图案讲究纹样对称，给人以四平八稳之感，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文化气息。2008 年，“宫毯”技艺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 年，国务院又将其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花卉方毯（图十八）。手工编织纯毛地毯是用绵羊毛纺纱染色后，按照设计图样织造而成。一般采用 8 字扣（国际上称波斯扣）栽绒打结制成。在每一英尺内毯面上累计打结的层数为地毯的道数，地毯的道数越多，栽绒的密度越大，地毯的质量越好，价格越贵。一般家用地毯为 90 ~ 150 道。



图十八　花卉方毯 纯手工羊毛地毯



图十九　多子多福 98K 金盘金毯

多子多福（图十九）。盘金地毯属于清朝官坊毯品种之一，专供皇宫使用。其工艺高超精湛，图案极具民族特色。目前故宫博物院尚有珍藏。其华丽精美，璀璨夺目，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工艺复杂，用料昂贵，早已濒临灭绝。自盘金地毯的挖掘成功以来，宫毯项目组又开发了多种题材盘金装饰毯。《多子多福》（图十九）即是由此衍生而来。图案主题是大石榴，中国传统文化视石榴为吉祥物，因石榴籽粒饱满，视它为多子多福的象征。编织润色技法的运用，更增添了石榴的圆润可爱。

中国龙（图二十）。为了抢救和挖掘濒临失传的盘金地毯编织技艺,经过反复的设计拆改试验，用金线成功地编织出这件作品。

龙是中国的象征，也是京式地毯中的常用图案。龙纹是旅游产品中经久不衰的保留形象。配上简洁的红木边框，更加突出了纹样的精致美观。

独特的盘金工艺，精湛的编织技艺，和地毯独有的片剪绝活，更让整件作品富丽辉煌，立体感强，中央团龙好似呼之欲出，极为精美。有一定的欣赏和保留价值。



图二十　中国龙 亚金盘金毯



图二十一　火光 98K 盘金装饰毯

《火光》盘金装饰毯（图二十一）。自盘金地毯的挖掘成功以来，宫毯项目组又开发了多种题材多种规格的盘金装饰毯。《火光》即是由此衍生而来。图案由古代陶器构成画面，中国的陶瓷文明世界，是祖国灿烂的文化之一，古老的陶器代表了中华文明的火光。

《吉祥》盘金装饰毯（图二十二）。自盘金地毯的挖掘成功以来，宫毯项目组又开发了多种题材多种规格的盘金装饰毯。《吉祥》即是由此衍生而来。图案传递出人们对美满和谐生活的愿望或追求，这种文化根深蒂固并将继续流传下去。



二十二　吉祥 98K 盘金装饰毯

七，京绣。一门古老的中国传统刺绣工艺，以北方民间绣为基础，同时凝聚了苏绣、粤绣等多种刺绣工艺精华的皇家手工绣，因此也称为宫绣，多用于宫廷装饰、服饰，用料讲究、技术精湛、格调风雅，民间高档的宫绣大都与皇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艺术创造力的结晶。西周时，我国先民就已经将刺绣运用到丝织品上，北京地区在汉代大葆台汉墓、老山汉墓出土了多件刺绣残片，元代在京城设有文锦总院、纹绣局，并开始使用金银线用于宫廷服饰的刺绣。明清时期开始大为兴盛，全国各地刺绣高手汇聚于宫廷，使得京绣有条件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为自身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清代京绣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京绣中最好为针工中的“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是以真金捻线盘成图案，或结籽于其上，十分精致、华贵。2014 年 11 月 11 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龙袍凤袍（图二十三）。吉服龙袍一般为清朝皇帝礼仪庆典等重要公务活动场合所穿用。吉服龙袍的下摆，绣有海水、寿山、祥云、红蝠、山石宝物等纹样，俗称“海水江崖”，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义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

凤袍，整件服装鲜艳华美，立领、右衽、两袖平直。大红色软缎地上满绣金丝龙凤纹，色彩丰富脱俗，整件衣格调庄重，设计精巧，工艺高超。此作品为皇后大婚时所穿衣服。服装纹样为双喜。吉服凤袍的下摆，绣有海水、寿山、祥云、红蝠、山石宝物等纹样，俗称“海水江崖”，具有传统的山水画特点，同时也是皇后身份的象征。

八，金漆镶嵌。是一种传统漆器艺术珍品，向来为皇家所用。以木胎成型、髹漆，然后在漆底上运用镶嵌、雕填、彩填、堆古罩漆、刻灰、平金开彩、断纹、刻漆、金银、罩漆等装饰技法。清王朝灭亡后，这门原本主要为宫廷服务的漆器工艺传向民间。漆艺最早出现和应用最广的是漆绘，这就自然离不开漆与颜料的结合。除了颜料之外，便是漆与金的结合。如描金、贴金、搜金、扫金、洒金、戗金等等。明代漆艺专著《髹饰录》称之为“金髹”，一名“金漆”。涵盖彩绘、雕填、刻灰等工艺皆可统



图二十三　龙袍 凤袍



图二十四　金漆镶嵌六条屏

称为“金漆”。“金漆”与“镶嵌”工艺的结合称之为“金漆镶嵌”。作品《金漆镶嵌六条屏》(图二十四)，是金漆镶嵌最具代表的作品。

雍容华贵的花丝镶嵌，古朴典雅的景泰蓝，华丽细腻的京绣等众多“燕京八绝”技艺作品，每一件都显示着传统手工艺的精益求精，蕴含着传统手工艺承载的老艺人在那个时代里曾无比珍视的造物信仰和超乎功利的用心。其拥有的精神理念和对产品的精雕细琢无不体现着工匠精神，可谓是燕京八绝，匠心筑梦。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展览协办单位北京梵品典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展览大纲。

(作者：江阴市博物馆陈列开放部)

2018–2019 江阴博悟联盟成果回顾

◎ 吴婉玲

2019 年是江阴博悟联盟开展的第三年，从一开始的懵懵懂懂到现在的逐渐成熟，这三年的稳步发展可圈可点。江阴市博物馆与江阴市城西中心小学的“博悟少年成长营”系列活动已逐渐形成系统化长效化的社教体系。

2018 年以“建馆——30 周年记忆展”为主线，开展了诸多延续性的研学活动：记忆的注解、记忆的评述、记忆的分享、记忆的点染、记忆的寻访。不同年级段的学生们通过给文物投票、收集老物件、手绘文物、萌说文物等新颖的方式来深入认识 30 件极具意义的“记忆”展文物。城西中心小学将同学们的成果编撰了《记忆》绘本，我馆也收集了部分手绘文物画作，举办了“涂说记忆”特展。

“问鼎”一课是 2018 研学活动中延伸的主题课程，由江博 30 年记忆展中的毛公鼎拓片出发，深入研究江博之鼎乃至世界之鼎，通过分组研学获得学校课堂外的历史文化知识。这一课也在 2019 年 1 月 3 日作为江阴市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现场观摩会的示范项目在江阴市博物馆举行。在观摩会上，采取了双师教学，由学校老师与博物馆老师引导，将研学成果在公开课中展示出来。当日有来自江阴市各个中小学的德育负责人近 200 人，进行了观摩学习。





（1 月 3 日江阴市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现场观摩推进会现场）

2019 年 4 月江苏省文物局发布《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库”遴选活动的通知》，旨在进一步发掘博物馆教育功能和文化资源优势，推进馆校合作常态化、制度化。我馆就“博悟少年成长营——问鼎”一课进行了项目申报。江苏省各大中小型馆共 46 个教育体验、馆校互动项目参与了汇报评选，“问鼎”最终入选 2018 年度“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库”十大示范项目。

3 月 10 日，以“万里江海通——江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特展”为契机，在江阴市博物馆中厅开展了歌唱“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此次活动也是由江阴博悟区域联盟的成员们共同策划完成的。六月底，我馆参与了江苏省的“媒体 + 新技术”案例交流评选，对快闪活动进行了简短的汇报，最终被评为了 2019 年度江苏省“传媒 + 新技术”优秀案例。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库”汇报现场）



（“传媒 + 新技术”案例汇报现场）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初中部	中国纸文化的实践探究——中学生文物修复课程
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让记忆照亮未来”七个一仪式化教育课
3	南京市博物总馆	探秘六朝——瓦当的一天
4	南京科举博物馆	“探秘科博”学程活动
5	江阴市博物馆	博悟少年成长营——问鼎
6	徐州博物馆	大马带小马，一馆连三校
7	常州博物馆、常州市博爱教育集团	你好呀，虫虫——昆虫主题教育课程
8	苏州博物馆	知行 @ 苏州——吴文化探索系列研学课程
9	苏州戏曲博物馆	“粉墨工坊”之开心画脸谱
10	泰州市博物馆	明服工坊

（2018 年度江苏“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示范项目”名单）


荣誉证书

荣获 2019年度江苏省“传媒+新技术”

优秀案例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传媒与新技术专业委员会

2019年6月27日

（2019 年度江苏省“传媒 + 新技术”优秀案例荣誉证书）

江阴市博物馆作为县级中小型馆，在很多硬件及资源方面是略欠缺的，但“博悟联盟”品牌活动却成为了我馆的一大亮点，多次得到肯定。博物馆是人类灿烂历史文化的汇集地，随着时代的前进，博物馆的工作不再仅仅是展示文物，而是从文物出发感悟历史，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也是重中之重。学校是青少年探索世界的开始，博物馆的社教应该与学校紧密联系，让文物渗透课堂，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所启迪。

未来，我们与城西中心小学的博悟联盟将会长期长效更广更深层次地发展下去，真正让“物”活化，指引青少年自发去寻找打开世界的钥匙。

（作者：江阴市博物馆陈列开放部）

2019 年江阴文博大事记

一月份

3 日，市博物馆开展江阴市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现场观摩暨“博悟”课堂推进会。

25 日，“万里江海通——江南与海上丝绸之路”开展暨长三角中小型博物馆联盟研讨会在市博物馆隆重举行。江苏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车宁、江阴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吴有为，以及常熟、张家港、太仓、吴江、武进、仪征、宜兴博物馆领导，在江阴市博物馆馆长翁雪花的陪同下参观了展览，并在江苏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车宁、江阴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吴有为的见证下，组建了长三角中小型博物馆联盟。

二月份

18 日，武进东南文化文物保护中心来市博物馆检测预修复书画。

三月份

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会开展了“融巾帼智慧 创美好生活”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副局长楚海芹、李克雨携局机关全体妇女、下属单位女领导等一行 50 人，在江阴市博物馆副馆长孙军的陪同下参观“记忆——建馆三十周年特展”。

10 日，市博物馆开展“扬帆起航——也谈江南与海上丝绸之路”专题讲座，由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主讲，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周晓虹、江阴市博物馆馆长翁雪花、志愿者代表等出席活动。

快闪“同声歌唱赞祖国”在市博物馆大厅上演，江阴市博物馆馆长翁雪花、城西中心小学副校长刘彩虹、江阴市博物馆志愿者代表、西郊幼儿园学生代表、江阴市实验中学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20 日，市博物馆保管科研部工作人员赴荆州文保中心接收修复好的馆藏漆器 7 件。

江苏省公布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市高城墩遗址、紫金桥申报成功，正式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7 日，我市两家重点文保单位兴国塔、尚仁初级商科职业学校旧址精细测绘项目通过了验收。测绘成果包括建筑测绘图、三维建模等，进一步完善文物档案资料。

28 日，江阴市博物馆配合无锡市考古所对华士砂山石室土墩墓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结束，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目前已完成 1 号墩、2 号墩、6 号墩、7 号墩、8 号墩的发掘，出土春秋时期的文物数十件。

四月份

7 日，市博物馆开展“把日子过成诗——香囊制作”社教活动，共 28 人参与。

17 日，市博物馆配合南京博物院，参与南沿江城际高铁线路江阴段的考古调查工作。

五月份

1 日，由江阴市博物馆、华侨博物院主办的“巧工匠心——华侨博物院藏雕刻精品展”于陶瓷馆开展。展览至 5 月 30 日结束。

5 日，由江阴市委宣传部、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江阴市文联主办，江阴市博物馆承办的“刘氏三杰——精品文物特展”暨《文开新域 流芳中华——刘氏三杰文物集萃》首发式在市博物馆举行。

16 日，由市博物馆主办的“邂逅无言——穆建英雕塑作品展”于临时展厅（二）开展。展览至 7 月 9 日结束。

由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江阴市文联主办，江阴市博物馆、徐霞客艺术研究院承办的“徐霞客路上的绿水青山国际画展”于陶白书画馆开展。展览至 7 月 9 日结束。

17 日，江苏省文物局委托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社会教育专委会组织了 2018 年度“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库”遴选活动，江阴市博物馆“博悟少年成长营——问鼎”入选 2018 年度十佳江苏省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示范项目。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江阴市博物馆首次联合南京博物院等 8 家省内博物馆举办博物馆之夜系列活动，共 100 名观众参加。

六月份

8 日，市博物馆二楼艺术体验区开展“站在东方看雕塑”讲座，由穆建英主讲，共 30 人聆听讲座。

七月份

7 月 1 日至 5 日、7 月 29 日至 8 月 2 日,江阴市博物馆举办为期两周的青少年暑期夏令营活动，共有 39 名青少年参加，每期五天玩学体验：坐上乾坤——椅子的故事、襟怀磊落——压襟的故事、鼎力相助——鼎的故事、秀色可餐——古代消暑小食、不见不“散”——伞的故事，从古人的衣食住行学习了解优秀历史文化。

18 日，由市博物馆主办的“那人那事 – 静赏斋文玩展”于临时展厅（一）开展。展览至 9 月 23 日结束。

八月份

15 日，“奢华的艺术——江阴市博物馆馆藏宋元明金银器特展”在内蒙古包头博物馆开展。展览至 9 月 15 日结束。

29 日—30 日，江阴市博物馆馆长翁雪花赴故宫博物院参加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良渚玉文化论坛。

九月份

17 日，市博物馆赴太仓博物馆参加“万里江海通——江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特展”太仓站开

展仪式并参加馆际交流座谈会。

30 日，由市博物馆主办的《入古赋新——李玮李洲陶艺作品巡展》在临时展厅（一）开展，共展出紫砂作品 93 件，展览至 11 月 30 日结束。

由市博物馆主办的《匠心筑梦——燕京八绝》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陶瓷馆开展，共展出展品 164 件（套），展览至 11 月 30 日结束。

27 日，在江苏省文物局、江苏省博物馆学会传媒与新技术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2019 年度江苏省博物馆“传媒 + 新技术”评选与培训中，江阴市博物馆“也谈江南海丝 唱响丝路红歌”快闪活动荣获 2019 年度江苏省“传媒 + 新技术”优秀案例。

十月份

1 日，喜迎国庆“绣”我中华社教活动在江阴市博物馆大厅开展，共 50 人参加活动。

13 日，接到群众举报，云亭街道美嘉城东敔山湾七号至九号地块的工地发现墓葬，江阴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勘察，发现有至少 6 个宋、明墓已经被盗掘。14 日，江阴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常驻考古队，协助无锡市考古研究所勘察工地现场，19 日开始协助无锡市考古所对七号、八号地块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至 12 月 26 日通过江苏省文物局组织专家的勘探验收。在考古勘探的同时，抢救性考古发掘八号地块，至 2020 年 1 月初共发掘唐代至清代的墓葬 60 余座，出土文物近百件。

24 日，江阴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对黄山炮台旧址的铁炮进行养护。

十一月份

1 日—4 日，上海科技馆专家至江阴市博物馆进行馆藏标本养护。

2 日，“‘蟹’逅”蟹类标本制作社教活动在江阴市博物馆大厅开展，由上海标本制作和养护专家姚坤荣老师主讲，共 10 组家庭参加活动。

23 日，景泰蓝挂饰制作体验活动在市博物馆二楼艺术课堂开展，共 20 人参加活动。

十二月份

9 日至 2020 年 1 月 18 日，江阴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协助无锡市考古所无锡至江阴城际铁路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及勘探。

10 日，小石湾炮台抢险加固工程竣工，并通过专家验收。

18 日，适园古建筑精细测绘项目竣工，并通过验收。测绘成果包括建筑测绘图、建筑摄影、三维建模等资料。

26 日 –28 日，江阴市博物馆馆长翁雪花、考古征集部高振威主任参加由浙江省文物局、嘉兴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学会、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承办的“马家浜遗址发现 60 周年系列活动”，参与马家浜文化博物馆落成典礼、《马家浜》考古发掘报告首发仪式、考察马家浜遗址现场、马家浜遗址发现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等。

（作者：王晓燕，江阴市文管办副主任；钱蓉，江阴市博物馆办公室）

特展



2019年1月25日-4月25日，“万里江海通——江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特展”在江阴市博物馆展出，展览由常熟、江阴、张家港、太仓、吴江五地博物馆首次联合策展，结合五地馆藏文物，讲述江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解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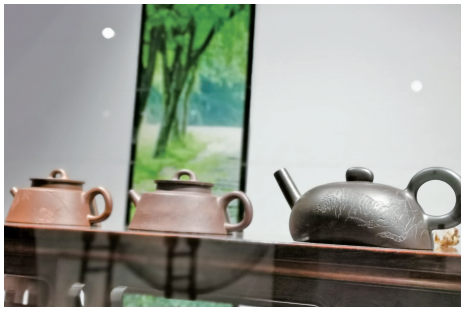


翁雪花馆长(右一)向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程政(右二)、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周晓虹(左一)介绍特展文物。

为纪念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闯将”——刘半农先生，2019年5月5日-7月10日江阴市博物馆承办了由江阴市委宣传部、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主办的“‘刘氏三杰’——精品文物特展”。市、局领导等出席开幕式并观展。



2019年7月19日-8月18日，“那人那事——静赏斋文玩展”在江阴市博物馆展出。展览立意“那人那事”，折射出文物背后文人生活的心境、时代文明的光芒，给人以修养身心之感。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展现新中国工艺美术70年成就，2019年9月30日-10月28日在我馆举办了“入古赋新——李玮、李洲紫砂陶艺作品展”，展出了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李玮教授的宜兴紫砂作品，展现了时代审美，凝聚了时代文化的力量。

外展



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严文华致辞

2019年8月15日-9月15日，我馆精选了馆藏82件金银器，赴包头博物馆举办“奢华的艺术——江阴市博物馆馆藏宋元明金银器特展”。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严文华、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文化遗产科科长杨洪、江阴市博物馆馆长翁雪花以及副馆长孙军出席特展开幕式。



2019年9月30日-11月30日展出“匠心筑梦——燕京八绝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让观众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了解传承已久的手工艺品，从而陶冶情操、提升精神文化境界。